

# 领导科学论坛

THE FORUM OF LEADERSHIP SCIENCE

# 大讲堂

2020年第6期 总第170期

P<sub>03</sub>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机制及前景展望

P<sub>20</sub> 携手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P<sub>44</sub>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是否会成为中国经济地位上升的契机

P<sub>59</sub>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与基本经验

P<sub>89</sub> 当前网络民族主义思潮的特点及引导策略





# 新时代创造新模式 新模式学习新思想

## 学习中国智慧党建云平台

学习中国智慧党建云平台是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新媒体、智能知识组织和新一代天地一体信息技术独家创新研发的多网跨终端共享的全场景智慧化党建多功能新型智能平台。平台为党建工作提供了全方位的综合解决方案，实现了党务和业务的智能化融合，为党的全面领导、党建的全面引领提供了信息化路径和智能化手段，让党务和业务实现无缝对接。

### 平台系统结构

1 党员干部学习全媒体资源库

2 智能化知识组织系统

3 多级党务业务一体化云平台

4 党员干部多级学习平台



5 智能移动终端融合应用系统

6 智能化党建运营管理中心

7 大数据分析、监控、演示系统

8 北斗双向卫星站

### 创建平台的目的是

- 解决党务业务“两张皮”问题
- 解决个人学习与集体学习“两张皮”问题
- 解决内容和技术“两张皮”问题
- 解决线上线下“两张皮”问题
- 解决单位内部的多平台和信息孤岛问题
- 解决多级多层重复建设问题
- 解决资源分散缺少系统性和逻辑性问题
- 解决缺少规范性和标准化问题
- 解决平台的安全问题

出品单位：《中国企业报》集团智慧党建研究院

联系方式：010-62805956、68001238

联系人：薛红霞15010167295 王强18518039399 刘红13126508885

- ◆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机制及前景展望**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陈建奇 (3)
- ◆ **携手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罗建波 (20)
- ◆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是否会成为中国经济地位上升的契机**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梅新育 (44)
- ◆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与基本经验**  
 .....北京市委党校 刘智峰 (59)
- ◆ **当前网络民族主义思潮的特点及引导策略**  
 .....河北廊坊师范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张春贵 (89)

## 编委会

顾 问	张全景 刘道玉 张国祚 杨叔子	董 事 长	肖昌斌
主 任	陈建才	总 经 理	周发秋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社 长	谢成宇
	王元璋 王泽龙 别少波	主 编	陈建才
	别业舫 何兴亮 何国治	副 主 编	张永平
	吴开胜 吴华品 周大仁	执 行 主 编	夏晓畅
	周 勇 周祖元 赵耀宏	外 联 部 主 任	薛红霞
	顾 杰 秦在东 梁前德	发 行 部 主 任	董晓丹
	彭元杰 谢成宇 蔡尚华	读 者 服 务 部	周蓉国
	熊泽金	责 任 编 辑	王 韬 赵春燕 钟 雪 马 程 侯 欣 周 凯
		美 术 编 辑	田良娟





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只要我们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就可以获得无穷的力量，风雨无阻，奋勇向前。

——习近平

主管单位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 湖北长江报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出版单位 湖北长江报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联办单位 国家与地方治理网

北京新时代中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原北京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编辑出版 领导科学论坛杂志社

发行广告部电话 010-68006063 68005003

编辑部电话 010-62807007转8148（北京）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2-1837/C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2095-5103

邮发代号 38-406

广告经营许可证 广登准字（2019）4200000016

编辑部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  
鸿儒大厦B座二层（西楼梯口）  
武汉市洪山区桂元路67号

编辑部邮箱 xxwdjt@163.com

ldkxlt@sina.com

出版时间 2020年6月15日

印刷 廊坊市凤海印务有限公司

定价 15.00元



#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机制及前景展望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陈建奇

**摘要：**目前，伴随着我国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的新进展，相关企业的复工复产也在有序推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未来，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大方向不动摇，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加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的协调对接，推动各区域合作联动。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影响；经济社会

2020年以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不断扩散，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目前，一些国家已经采取了非常严格的管控措施，客观上对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较大的冲击。比如，现在美国的失业人口数量大幅度上升。原有的很多服务业岗位，现在因为限制人口流动，这些岗位出现了空缺，带来了大量的失业，而失业的结果导致收入水平的下降。与此同时，社会的稳定，包括整个生产生活的秩序都将受到较大的冲击。

那么，不断扩散的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到底是什么？该如何看待这个影响？未来又该怎么办？文章主要侧重从经济社会的角度来谈疫情的影响以及未来的前景。

对当下疫情的蔓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在3月26日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向各国元首致辞：这是一

场全球危机，需要全球应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这番表态，说明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对全球构成了影响，需要世界各国来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现在整个疫情不断的升级，涉及的国家越来越多，特别是确诊的病例越来越多。

截至2020年3月底，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70万例，且这个数字仍然在不断上升。从这个角度讲，疫情所带来的影响范围、涉及的人口数量确实是很巨大、很突出的。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向全世界拉响了警报，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倡议。世界各国也在积极研究如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3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发表讲话《携手抗疫 共克时艰》，明确提出四点倡议：第一，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第二，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第三，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第四，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其实，这四点倡议中最为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强调了开展国际协调的重要性。病毒没有国界，这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我们不仅在疫情防控上要联手应对，阻止疫情不断扩散、升级，还要加强世界经济的稳定以及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这都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世界各国要加强合作，携手抗疫。

当然，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认识到世界各国联手抗疫的重要性。在3月26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各方在发言中均认为，面对这一全人类的共同危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和合作，应迅速采取协调、有力行动，有效切断疫情传播，加强药品和疫苗研发等科研合作，加大对患者救治力度，有力维护民众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峰会发表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声明》，重点阐述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抗击新冠肺炎大流行；二是维护世界经济；三是应对疫情对国际贸易造成的干扰；四是加强全球合作。这就告诉我们，疫情可能对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特别是对国际贸易造成了显著的扰动。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这个关键时刻召开了特别峰会，专门研究如何应对这个问题，既体现了世界各国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关注，也体现了全球合作的重要性。

当下，讲疫情、讲合作既是世界主要国家共同的认识，也是疫情发展至今人类被迫采取的一种共同应对方式。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关注疫情呢？道理很简单，因为疫情极大地冲击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了防控疫情，我们关闭了工厂、商店，封锁、限制了航空、铁路、公路等交通运输。对工人来说，工厂的关闭几乎是毫无预兆的，由此带来了失业人口数量的快速飙升，贫困化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与此同时，企业因缺失了良性的经营发展空间，会带来资本市场的剧烈动荡，引起社会矛盾，甚至影响社会的稳定。

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人们对这次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态度表现得格外谨慎。那么，它跟以往的疫情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问题的回答很重要，因为近几年也出现过不少其他疫情，比如 2009 年春季甲型 H1N1 流行性感冒疫情、2014 年春季南亚和非洲的脊髓灰质炎疫情、2016 年巴西等国的寨卡疫情、2014 年至 2016 年在西非多国致死上万人的埃博拉疫情、2018 年以来在刚果（金）暴发的埃博拉疫情等。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疫情并没有消失，但人们对最近几年的这些疫情并没有表现得那么紧张，是因为得到了一个共同的认识——社会上尽管有疫情，但是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都还是相对可控的，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基本面没有造成大的冲击，伴随着疫情的结束，经济社会可以较快地回归常态，进入稳步发展的轨道。

而这次疫情不同。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疫情引发了世界主要国家资本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比如，2020 年 2 月以来，受疫情不断升级的影响，美国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标准普尔 500 指数）都出现了大幅下挫。3 月 9 日到 3 月 18 日，美国股市 10 天内就出现了 4 次熔断，这也表明这次疫情对美国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的波动，疫

情引发美国经济衰退的规模和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当然，不仅仅是美国的股市熔断，其他国家的股市也出现了熔断（见图1）。熔断是股市的一种机制，也叫自动停盘机制，是指当股指波幅达到规定的熔断点时，交易所为控制风险采取的暂停交易措施。当它的跌幅超过一定程度以后，股市交易会暂停几分钟，目的是让大家有一个头脑清醒的过程，避免非理性的抛盘；当然，涨得过高也会出现熔断。但是即便采用这个机制，股市继续剧烈动荡的趋势依然没有被遏制住。这些迹象都在告诉我们，这次的疫情不同于以往，也因此引起了人们的担忧。

各国熔断机制				
国家	标的	防线	阈值	熔断时间
美国	标普500指数	下跌	7%、13%、20%	一二级熔断15分钟且仅能触发一次，三级当天暂停交易
韩国	KOSPI指数	下跌	8%、15%、20%	一二级熔断20分钟，三级当天暂停交易
印度	SENSEX指数	双向	10%、15%、20%	一级熔断60分钟、二级熔断120分钟，三级当天暂停交易
中国	沪深300指数	双向	5%、7%	一级15分钟，二级暂停交易

图 1：世界主要国家熔断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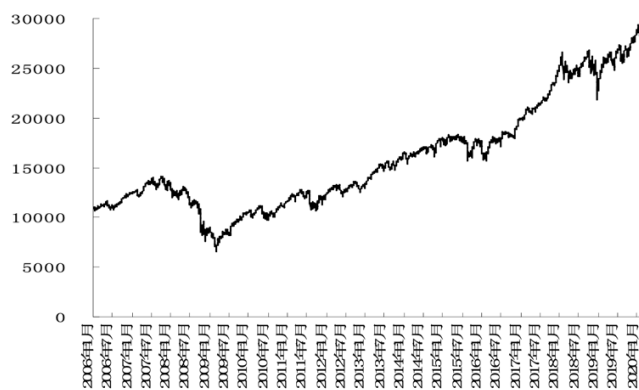


图 2：道琼斯指数走势（2006年1月—2020年1月）



人们到底为什么如此担忧呢？从2016年1月到2020年1月道琼斯指数走势（如图2）可以看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美国股市出现了剧烈的波动、下挫。因此有人担心，新冠肺炎疫情在引发了股市、金融、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后，会不会再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众所周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很多方面带来了重大影响，全球经济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得以慢慢恢复。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有人把它称作“百年一遇”，甚至有人把它和20世纪30年代横扫全球经济的大萧条相提并论。当时的经济大萧条也带来了诸多方面的影响。

**第一，汇率竞争性贬值，可能演变成货币战争。**当时，有不少国家开始大幅度下调汇率，让货币贬值，使自己国家的商品比其他国家的便宜，促进出口、拉动外需，推动经济增长。当然，任何国家都可以让货币贬值，但如果都希望通过货币贬值来刺激出口，那么最后就会演变成为货币战争。

**第二，贸易保护主义，采取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两种措施。**大萧条以后，很多国家都希望能够稳定市场，开始采取各种各样的贸易保护主义，力图通过拉动内需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如采取加征关税、加大贸易壁垒等。但最后反而带来了国际贸易增长预期的大幅下调，压缩了世界各国经济的合作空间，致使世界经济进一步面临下滑的压力。

**第三，严格资本管制，资本流动大幅下降。**经济下滑会带来资本的跨境流动，即一个国家的经济形势如果不好，资本投资就会流去其他国家。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全球资本流动大幅下挫，很多国家采取了严格的资本管控，造成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流动出现了最低水平。

**第四，经济长期衰退，失业率大幅上升。**金融是资本经济的血液，缺乏资本，经济就不能发展。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失业率飙升，经济陷入了长期的衰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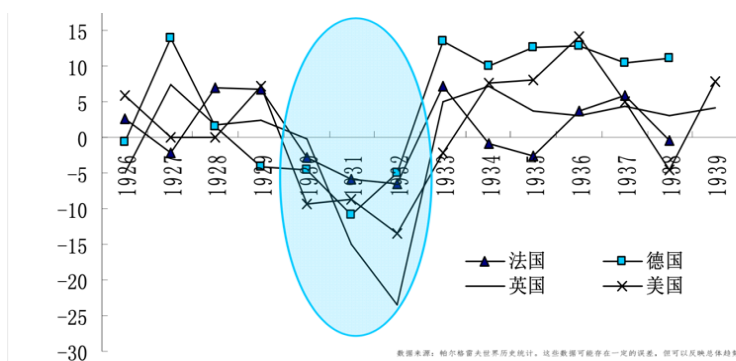


图 3：大萧条期间各国 GDP 增幅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在大萧条期间，西方各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都出现了 4~5 年的经济衰退，而且有的国家衰退幅度超过两位数。回顾 20 世纪 30 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目的就是让我们理解万一出现一些极端情形，世界各国会遭遇哪些麻烦。因此，随着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人们普遍担心会出现类似 20 世纪 30 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经济长期低迷的情况。如果真的出现，未来几年我们会非常麻烦。那么，既然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那么可怕，为什么在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又出现了稳步的复苏与增长呢？事实上，经济之所以复苏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应对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时，采取了强有力的全球合作的政策举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专门分析研究了造成 20 世纪 30 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出现的原因。他认为，最重要原因是世界各国各自为政，央行没有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加上有些政府的不作为，特别是在货币和财政政策上的不作为，最终导致大萧条局面出现。因此，为了应对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美国迅速推出了量化宽松政策，中国也推出了最初被称为人民币 4 万亿元的刺激计划以支撑经济发展。2008 年 11 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在华盛顿举行，此次峰会的主要议题是评估国际社会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取得的进展、探讨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国际金融领域监管规范和金融体制改



革。包括美国、英国、日本、欧盟和中国等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相继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并出台了一揽子财政支出方案，携手合作、同舟共济，共同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最终，全球经济并未出现长期萧条的局面，仅仅在2009年出现了衰退，2010年以后全球经济就开始了稳步的复苏与增长。可见，尽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可以与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相提并论，但因为国际协调合作，世界各国的央行、财政部门联手合作，进行了大规模的财政与货币刺激政策，有效应对了危机带来的负面冲击。

如今，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各国都在密切分析未来的形势，认真研判并准备出台一系列宏观经济的稳定政策。其中，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宣称，美联储将下调联邦银行利率到0%~0.25%，即我们说的零利率，同时重新开启量化宽松政策。有不少人认为这次美联储的行动非常快，虽然对于该举措能否有效缓解疫情对经济社会影响还有待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次的应对政策总结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经验，最突出的是美联储超常规货币政策操作。

美联储货币超常规货币政策计划出台以后，包括欧盟、日本、中国等都在积极地研判，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宏观稳定的货币财政政策。由此可见，本次疫情确实跟以往的疫情不一样，而且很多国家采取的动作也是不一样的。大家不能低估这次疫情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但也不必太过担心，因为现在很多国家已经明确并正在部署一揽子宏观经济的稳定政策。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除了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影响以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那么，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到底有哪些方面？

在经济学意义上，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有五个方面，我们称为“五大支柱”，即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制度。其中，劳动力、土地、资本被称为三大要素。各国发展经济，不管出台什么政策，大部分都是侧重对这五个方面补短板并发挥自己的优势。比如，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释放了劳动力要素的相对优势。相比疫情对金融的影响，其对土地的影响应该说是短期的。从这个角度讲，疫情除了影响金融市场，还直接影响了交通、餐饮、旅游、影视、娱乐等行业。显然，疫情对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的影响是通过对经济中各个行业的影响传导而来的。

疫情暴发后，在技术方面，有些国家停止了很多部门的生产活动。如今，全球化的最大特点就是国际分工。比如，汽车的生产并不是由一个国家单独完成的，而是由多个国家共同完成的。换言之，有些国家只生产汽车的某一零部件，有些国家专门搞组装等。但受此次疫情的影响，这些国家很可能无法从事正常的生产工作，这也就意味着汽车的某一个零部件的生产将受到影响，随之会对汽车生产行业带来巨大的冲击。可见，疫情对技术合作、产业合作方面均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可能致使产业链断裂。

与此同时，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还体现在制度管理方面。此前一个企业、一个公司要发展，需要天天进行沟通协调，但如今因为疫情，很多人不能聚集在一起进行讨论以及密切沟通，这就给企业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企业应该怎么管理员工？员工之间应该怎么合作？员工跟外部的合作又应该如何开展？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会给企业带来新的挑战。因此，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仅体现在金融市场方面，还会对劳动力、技术、制度管理等其他要素造成影响。

当前，有人提议我们要将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用到这一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影响的问题上来。2020年3月26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召开特别峰会，研究要通过国际协调共同应对疫情的负面影响等问题。然而，大家能否如2008年那样抱团应对危机？目前看来，可能没那么简单。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与2008年金融危机虽然有相似之处，但又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些不一样可能会带来国际协调的困难与挑战，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 第一，国际经济环境不一样。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环境来看，疫情全球性扩散与金融危机存在显著的差异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认为，这次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截然不同。经济大萧条源于人类问题，源于货币金融方面的冲击；而这次则更像是重大的暴风雪或自然灾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银行体系冲击了整个经济环境；而这次是疫情全球性扩散对经济的冲击影响了银行体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两大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受到冲击，当时它们所持有或担保的住房抵押贷款总额约为5.3万亿美元，几乎占了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总额的一半。陷入次贷危机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导致银行贷款没有了资金的保障。此次疫情期间，银行运转良好，问题是经济发展缺乏活力，生产被迫停止，经济下滑、下挫，这样所带来的是经济的波动，进而影响金融体系。因此，从整个影响机制来看，这次疫情跟2008年金融危机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另外，从环境来说，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问题较为突出，“逆全球化”现象备受关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很多国家认为世界各国必须加强贸易往来和产业链合作，通过合作拉动经济增长，因此当时世界各国较容易协调合作。可是近年来，特朗普政府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其他一些国家也设置各种贸易壁垒，表明当前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环境存在巨大差别。现在有些国家不愿意合作，而是想要各自为政。

## 第二，宏观政策空间不一样。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空间来看，财政债务高位运行促使世界各国宏观政策协调空间大幅缩窄

在经济社会受到疫情等意外冲击时，世界各国会通过宏观政策协调，实现经济社会稳定的目的。一般说来，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各国会通过财政刺激拉动经济增长；财政如果支出过大、收入缩减，就会发债，但需要衡量发债的债务风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等世界主要国家债务水平不高，但当前世界主要国家债务负担大多处于高位运行状态。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已经由 2008 年的 62.6% 上升到 2019 年的 105% 以上。债务的飙升表明要进一步收缩发债的空间，因此，拉动经济增长需要采取新的措施。其实这个问题在其他国家也较为普遍。比如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包括意大利、法国、德国等欧洲很多国家倡导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结果 2010 年以后出现债务危机。可见，就算现在通过二十国集团让这些国家共同实行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政策空间肯定也不如从前。

### 第三，各国的诉求不一样。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诉求来看，世界各国分化引发国际协调较难就具体政策达成共识

目前，部分国家的疫情仍处上升期，而且不同国家的防疫形式也不一样。有些国家现在的重点是抗击疫情；有些国家如中国，现在的重点是全面复工复产；还有一些没有大规模暴发疫情的国家，现阶段的重点就是防控疫情，做好防止输入性风险的应对。因此，从防疫形势看，各国的诉求不一样，较难就具体政策达成共识。

从以上三个“不一样”可以看出，这次疫情所带来的影响不同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因此我们要采取的政策也不能是简单地复制十多年前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综合看来，这次疫情带来的影响较为复杂和特殊：

第一，疫情的影响很大，金融资本市场剧烈动荡，有可能出现类似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甚至大萧条的局面。第二，我们虽然有 2008 年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但是这个经验还不能简单复制来应对现在的情况。未来，疫情可能会持续带来一系列的影响，涉及三个方面的风险：

#### 第一，可能爆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最近，包括原油以及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出现了剧烈的波动。在这种情况下，疫情掀动全球金融市场波澜，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可能会上升。同时，我们也要警惕第二波疫情暴发的可能性。这也就是说，在疫苗研发出来之前，或者说针对新冠肺炎的药物被开发出来之前，我们要做好应对



较大风险的准备。

## 第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可能诱发“逆全球化”趋势上升

疫情出现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经济将出现大幅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加之全球经济重新走向分化，很多国家都要稳定经济、控制市场，可能就会出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所面临的各国加征关税、设置贸易壁垒等情况。如果大家各自为政，直接影响就是“逆全球化”趋势上升。

## 第三，产业链、价值链重塑可能诱发产业转移

这次疫情与其他危机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相比，最大的不一样在于，产业链、价值链的重塑越来越清晰。在这次疫情中，一些发达国家的口罩大部分都是通过进口获取。可见，他们会反思其产业链政策问题，可能会把全产业链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一方面，他们可能认为，未来要在自己国家对一些关键的商品实行全产业链的政策，这就要求从商品的研发到后期的加工组装整个产业链都要在国内；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商品他们可能希望降低风险，不仅仅依赖一个国家，而是很多国家。比如，原来一些零部件只在印度生产，现在想扩展到中国、欧洲等其他地方。这就意味着，现有的产业链布局可能就不再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还有可能带来产业的大规模转移。由此可见这次疫情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全球疫情带来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势必也给中国造成重大冲击。国家统计局和工信部发布了2020年1月至2月期间的主要经济数据。从生产来看，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3.5%，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13%；从需求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4.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0.5%。另外，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38.3%，企业亏损面达到36.4%。

2020年2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35.7%，比上月下降14.3个百分点，创下2004年开启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但随着党中央、国务院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目前企业复工率回升较快，生

产经营活动正有序恢复。截至2月25日，全国采购经理调查企业中，大中型企业复工率为78.9%，其中大中型制造业企业达到85.6%。

国家统计局表示，中国制造业PMI在经历2月“坠落”后，3月呈现“V字”反弹，最终录得52%，重回扩张区间。但是，这只是反映一半以上的调查企业复工复产情况比上月有所改善，并不能代表我国经济运行已经恢复正常水平了。数据显示，2020年3月，大、中、小型企业PMI均回到临界点以上，分别为52.6%、51.5%和50.9%，大型企业复苏相对较快。尽管如此，企业仍然面临着资金紧张和需求不足等难题，企业生产经营压力仍然较大。由此看出，疫情对全球的影响主要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国内疫情严格防控伴随生产经营活动停滞，宏观经济减速压力显著增大，金融资本市场震荡；

**第二阶段：**疫情全球性扩散升级，国际经贸合作环境急剧恶化，进出口贸易及产业链合作的影响开始凸显，外需放缓成为突出的影响；

**第三阶段：**疫情全球性扩散趋势见顶回落，欧美相关国家将复工复产置于突出地位，全产业链的发展可能成为战略重点，贸易合作的外部形势可能较为复杂。

在这样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可能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今年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因为要研发疫苗，防止疫情反复，各个国家都会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换言之就是处于震荡阶段；

**第二阶段：**疫苗研发出来之后，将推动要素流动回归正常化；

**第三阶段：**有了防控疫情的办法，我们的经济运行就逐步向常态化复苏。

从世界范围看，短期之内，各国的防控举措不会松懈，交流合作将会非常谨慎，全球经济衰退可能难以避免，国际贸易增长也将大幅减速。3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与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电话会议结束后发表声明称，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或将出现衰退，至少像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一样严重或更严重，但预计2021年能

够出现反弹。经济已经并将继续受到严重影响，但病毒被遏制得越快，经济复苏就会越快、越强。目前最重要的是优先实施防控措施并加强卫生体系——每个国家都必须这样做。

3月25日，WTO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Roberto Azevêdo）表示，COVID-19大流行对全球经济、贸易都将产生巨大影响，并将影响就业以及民众福祉。他透露称，WTO经济学家正在分析这场危机的后果，“预见贸易将急剧下降”，“新冠病毒对经济的冲击要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大”。现在看来，贸易已经开始大幅下降了，而且贸易下降不仅仅带来经济下滑，还会带来新的影响人类生活安全的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比如，粮食安全。在贸易流通不畅的背景里，粮食关系人的健康、生活、生命的延续。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联合声明，呼吁各方努力确保粮食贸易的自由流通，以确保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粮食安全。声明同时警告，食品供应领域存在的不确定性有可能导致各国竞相实施出口限制，从而造成全球市场短缺，食品价格飙升和波动性增强。过去的危机告诉人们，限制出口的措施尤其危害到低收入和食品不足的国家，也将危及人道主义机构为困厄中的人筹集食物的努力。可见，贸易的减速不仅仅带来了经济减速、粮食安全的问题，还会带来其他一系列的我们可能没有预料到的新的风险及问题。

目前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一是经济衰退，二是贸易大幅减退，三是粮食安全问题。这些方面综合交织起来，最后可能反映到金融系统性风险问题上来。所以从短期看，我们要高度关注疫情的蔓延、扩散对经济社会所带来的意外冲击。当然，讲经济不能看短期，还得看中长期以及未来。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多次经历过疫情，但疫情大多对经济社会，尤其是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构成根本性的影响。因此从中长期来看，我们也不要过于悲观，因为随着疫情防控取得重大的进展，全球经济包括中国经济都有望稳步恢复到常态化水平，这是疫情对经济社会影响的一个基本判断。

那么，我国应该怎么样来应对疫情的影响呢？目前，我国国内疫情已得到基本控制，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现在反过来看，我国所采取的一系列防控和救治举措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在3月已经超过50%。尽管经济还没有回到常态水平，但整个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在不断改善，生产生活秩序也在加快恢复。这也表明我国采取的举措是有效果的。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世界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当下，我们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已经推出的一系列稳增长政策做实，让它持续发力。同时，我们要不断改进和创新宏观调控政策，以此促进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3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强调：“要把复工复产与扩大内需结合起来，把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释放出来，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使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得到回补。要选好投资项目，加强用地、用能、资金等政策配套，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其中，宏观调控政策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 **第一方面，短期政策。**

**一是防御输入性金融风险。**短期来看，我们要不断加大金融风险防范力度，采取一系列措施，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对我国的冲击。近年来全国财政每天在央行国库的现金存款余额达到3万亿元左右，客观上为我国防范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二是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税降费是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性举措，降低了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拉动了消费、投资、就业增长。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不少企业带来了影响，我们更要想办法降低企业的成本、减轻企业的负担。



**三是扩大内需，让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中国有着巨大的市场，在降成本的同时要扩大内需，要让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帮助国内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地区和群体尽快恢复正常生产和经营。

**四是重视全产业链战略。**我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要反思产业链的问题。眼下中国制造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游环节——加工组装，部分领域核心关键技术和特殊原材料（如高端芯片）受制于人。因此，未来我们要更加注重全产业链战略。

**五是加强国际协调合作。**全球形势越是复杂的时候，我国越是要保持战略定力，不断与其他国家沟通与协调，改善外部环境，稳定外部市场，共同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诚然，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样的时代背景里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 **第二方面，中长期政策。**

这次疫情突如其来，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虽然巨大，但是短期的、暂时的。从中国经济基本面来看，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首先，整个内需市场依然非常大；其次，我国人均GDP仍然跟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未来有较大的追赶空间；最后，我国产业链比较完整，创新能力也在不断提升，产业正在加速转型升级，这些共同支撑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伴随着疫情的逐步稳定，中国经济的前景依然光明。

近几十年来，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如今，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依靠进一步改革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为此，我们不仅要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全面做好“六稳”工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确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就，不断打造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

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由此拉动了整个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1992年，上海浦东新区成立，由此拉动了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我国逐渐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等多个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构建了现代化的城市群，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深圳的发展推动了珠三角城市群的建立，广东、东莞、深圳、广州等城市形成了产业合作的城市群；上海的发展推动了苏州、南京、宁波、杭州等长三角城市群的建立。

201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通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深圳已经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城市。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支持深圳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有利于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新格局。由此可以看出，深圳将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它构成了中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标，同时也是引领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深化、在世界合作中释放中国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模板。

通过改革开放，我国在全球竞争中有了较强的竞争力。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有必要通过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加快形成开放合作、开放创新、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发展新格局。即我们要深化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同时还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其他国家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形势在加快变动，世界格局在加快转变，但

中国的发展方向不仅不会因为疫情受到改变,而且能够继续推动其他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合。当然,在目前的疫情影响下,我们还要对一些国家政策更加内顾、全球供应链不稳定和贸易摩擦升级等问题保持警惕。

目前,伴随着我国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的新进展,相关企业的复工复产也已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未来,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大方向不动摇,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加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的协调对接,推动各区域合作联动。可以预期,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定健康发展,一定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根据“学习中国”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文韬 马程 钟雪

# 携手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罗建波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严峻的全球性挑战，面对人类发展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抉择，各国应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积极做行动派、不做观望者，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国际社会要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为引领，真诚加强团结、深化合作、密切协调，不断提升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水平，不断提高全球人民的共同福祉，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关键词：**中国；公共卫生安全；治理；全球；疫情；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纵观人类发展的文明史，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史。从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到1918年威胁整个世界的“西班牙大流感”，再到2020年初肆虐整个世界新冠肺炎疫情，人类一直面临着重大传染性疾病的威胁。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近百年来遭遇的一次较为罕见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也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危机。它给我们整个人类的生命健康带来了巨大威胁，也给世界经济带来了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冲击。

这次疫情让我们意识到了两个问题：第一，人类一直面临重大传染性疾病的威胁。某种程度上，这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人类社会安全的影响可能比传统安全威胁更大。第二，国际社会对重大传染性疾病的应对不足，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严重滞后，亟须加强。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世界见证了中国的大国责任和担当。



当。习近平总书记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多国领导人进行通话，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再再呼吁，国际社会要同心协力，共同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他特别呼吁，国际社会要致力于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加强联防联控，携手推进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我们向国际社会提出的一个新理念。

携手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是中国向国际社会发出的一个正能量的创意。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的时候，中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贡献了自己的理念。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内涵和基本精神呢？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我们又该如何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进程呢？

## 一、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始终威胁人类安全

联合国 1994 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首次提出并界定了“人的安全”的概念。“人的安全”是一个“大安全”概念，不仅包括我们常说的因为战争、饥饿或政治迫害而死亡，疾病的困扰、重大传染性疾病的威胁等，也都纳入“人的安全”的视野，其内涵和外延是广泛的。

当说到重大全球性公共危机或者重大传染性疾病威胁人类安全时，我们脑海里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全球化。因为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人类是高度互联互通、高度相互依赖的。重大传染性疾病在这种情况下才得以扩散和传播。其实，大规模流行性疾病早在全球化时代开启之前就已经存在。比如 10 世纪的欧洲，那时没有飞机、没有汽车、没有火车、没有游轮，但中世纪的欧洲却暴发了一场罕见的大瘟疫——“黑死病”。不到 10 年，这场瘟疫夺走了 2500 万欧洲人的生命，而 2500 万人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 1/3。要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迄今最惨烈的战争，当时欧洲因为战争死去的人也不过占其总人口的 5%。由此看出，“黑死病”夺去了 1/3 欧洲人的生命是非常惨烈的。

事实上，这场大瘟疫起源于中亚，1347年由东征的“十字军”带回欧洲。“黑死病”其实就是鼠疫。这场瘟疫首先从意大利开始，然后蔓延到西欧、北欧、波罗的海地区，再到俄罗斯。以国家而论，在这场大瘟疫中，意大利和法国受灾最为严重，而少数国家如波兰、比利时等侥幸地成了漏网之鱼。以城市而论，受灾最为惨重的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80%的人死于这场瘟疫。

当时，意大利人文主义作家薄伽丘在其著作《十日谈》中，把佛罗伦萨描绘成人间地狱：“行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地而亡；待在家里的人孤独地死去，在尸臭被人闻到前，无人知晓；每天、每小时大批尸体被运到城外；奶牛在城里的大街上乱逛，却见不到人的踪影。”

“黑死病”暴发于14世纪的欧洲。一个世纪后，大西洋对岸的美洲大陆又暴发了一次严重的瘟疫。我们知道，15世纪至16世纪是西方大航海时代，世界各大洲开始真正地连为一体。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以西班牙人为首的欧洲人开始源源不断抵达新大陆淘金。这种全球性联系，为疾病的全球蔓延提供了条件。

1520年3月，一个天花病毒携带者到达墨西哥，天花迅速在中美洲蔓延。虽然那个时候没有火车、汽车，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天花疫情迅速在中美洲扩散，至少1/3的印第安人因此而消亡。印第安人长期与外部世界隔绝，对天花这种传染性疾病没有免疫力，因此遭遇了毁灭性的灾难。那时正值西班牙人侵略中美洲时期，由于印第安人的大量死亡以及他们明显落后的武器，殖民者最终征服了整个美洲，墨西哥境内著名的阿兹特克帝国和美洲大陆南边的印加帝国的命运因此而终结。今天我们只能在考古著作和博物馆里领略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加文明的盛况。

“印第安人”这一称呼是欧洲人对美洲土著的统称，后来通行于世界，也称“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擅长农业种植，我们熟悉的玉米、甘薯、马铃薯就是印第安人培育再由殖民者传播到世界各地的。16世纪，玉米、甘薯、马铃薯传入中国，并因其高产、易种而迅速在我国发展起来。

如果说欧洲“黑死病”和美洲天花都还是区域性的疾病大流行，那么到了1918年，一场真正意义上肆虐整个世界的传染病登场了，这就是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其实这场大流感并不起源于西班牙，而是美国。1918年3月，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一处位于美国堪萨斯州的军营发生流感。流感病毒随着美军抵达欧洲战场而传播给了各国军队；战争结束后又随着各国军队回国传播到世界各地。起初，流感病毒的症状只有头痛、高烧、肌肉酸痛和食欲不振而已；但到了1918年秋季，病毒变得更具危险性，传播性更强，致死率更高，在全球迅速扩散，对人类的威胁开始凸显出来。至1920年春季，全球约10亿人被感染，近4000万人死亡，比持续了52个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亡人数还多。所以我们说，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人类健康和生命的影响，有时候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传统安全威胁。

这次流感病毒其实并非起源于西班牙，但为什么世人称之为西班牙大流感呢？因为当时西班牙有800万人感染了流感，甚至连西班牙国王也感染了，所以很多人误以为西班牙才是病毒的发源地。

今天，世界早已是一个真正全球化的世界，地球早已是一个“地球村”，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大家庭。特别是20世纪以来，由于人口增加以及交通工具的大发展，人类互联互通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快速和便捷。据报道，2018年全世界跨境游共计14亿人次，这个量是巨大的。东京、纽约、墨西哥城、北京、上海这样的现代大都市，常住人口都超过1000万人；加上全球交通网络远比1918年时发达，一个国家或城市“获得”一种新流行病原的时间可能就是一架飞机的飞行时间，人类也更容易受到传染病的危害。

在西班牙大流感暴发后的一个世纪，人类再次暴发了一次危及全球的传染病，这就是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世界卫生组织将命名为“COVID-19”。这场疫情的传播速度之快、覆盖范围之广、防控难度之大、产生影响之深实属近几十年内所罕见，给人类生命健康带来了巨大威

胁，给全球经济带来了重大影响，给国际社会带来巨大挑战。

纵观历史长河，人类发展的文明史，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史。人类发展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化社会，虽然自身保护与社会发展能力大大加强，但我们面对未知的新型流行疾病突发时，还是会暴露出各种“脆弱性”。研究表明，目前在世界流行的疾病不少于22种，而且多种重大传染性疾病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蔓延得较为迅速。因为这些国家的公共卫生条件相对较差，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医疗条件也不如发达国家。

病毒没有国界之分，没有种族之别。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病毒的传播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迅速，对社会的影响可能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严重。全球化时代的重大疫情危险之处在于，它不仅威胁单个国家的生命健康，削弱单个主权国家对公共卫生的控制能力，而且一国内部的公共卫生事件可能会迅速演变为全球的公共卫生事件，从而威胁全人类的生命健康，挑战着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能力。

就人类公共卫生治理能力而言，我们大体从两个层面来讲，一个是国家层面，一个是全球层面。

在国家层面上，各国应对重大疫情的能力严重不足。2019年10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经济学家智库联合发布了“全球卫生安全指数”（GHS Index），用来评估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卫生安全水平。GHS Index显示，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在应对重大传染性疾病的资源和能力等方面普遍准备不足。更为严重的是，很少有国家能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发生时有效运用这些资源或发挥这些能力。如果以100为满分的话，首个GHS Index中195个国家的平均得分仅为40.2分；也就是说，单个国家应对重大疫情的能力严重不足。

在全球层面上，客观来讲，我们也尚未建立起成熟的全球性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历史上，虽然人类在共同应对重大传染性疾病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机制，也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总体来讲，经验、能力还是不足，机制



也尚未健全。二战后，经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决定，64个国家的代表于1946年7月在纽约举行了一次国际卫生会议，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1948年4月7日，该法得到26个联合国会员国批准后生效，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告成立，其宗旨是“使全世界人民获得尽可能高水平的健康”。此后，面对一些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时候，国际社会也做出了许多努力。但总体上讲，国际社会协调应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的意愿、能力和经验都不足。

重大疫情对人类社会的冲击，除了疾病本身的因素之外，还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应对举措。疫情肆虐，世界各国只有团结协作，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才能打好这场疫情防控的全球战争，共同护佑世界各国人民的安宁。但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发展与完善是一个漫长过程，我们需要克服障碍和挑战，解决矛盾和问题，继续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进程。

## 二、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019年3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鲜明指出，国际社会正面临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四大挑战，并提出破解这“四大赤字”需要秉持四大理念：公正合理、互商互谅、同舟共济、互利共赢。这一中国方案的背后，有时代命题、中国理念，也有中国格局、中国担当。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凸显了“治理赤字”，充分暴露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缺陷和短板。当今世界，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面临的主要矛盾是，重大传染性疾病威胁日益突出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严重滞后的矛盾，而治理体系不强、治理能力不足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面对严峻挑战，世界本该真诚携手合作，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成效并不显著。国际社会团结合作所面临的障碍究竟是什么？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改革

为何难以得到实质性推进？

### （一）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难度大

近年来，随着跨国人员往来密切、生态环境恶化尤其是世界发展的不均衡、不稳定，传染性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的全球扩散态势进一步加剧，一些古老病毒死灰复燃变异升级，一些新的病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接踵而来，严重挑战着人类生命健康的底线，患病和死亡人数触目惊心。

然而，作为与病毒斗争的最有力武器，科学技术攻关面临巨大难题和瓶颈。从精准的病毒检测，到科学的临床治疗，再到长效的疫苗防控，都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需要大量科研人员长时间的努力攻关。而且，各个国家需要携手合作。特别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而言是一次全新的挑战，我们对此病毒知之甚少，因此就更加难以有效防控，难以实现科学技术、医疗诊疗技术的突破。

另外，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已陷入一个“怪圈”：当灾难来临时，我们高度警觉、高度重视，各国加大合作；当威胁减轻后，公共卫生则在国际议程中的重要性立即下降，会被传统地缘政治问题所掩盖，被一些重大热点难点问题所冲淡。比如，平时世界各大媒体关注的舆论焦点大都是朝核危机、伊核危机、叙利亚危机等话题，而对卫生、防疫、气候变化这些议题并不太重视。这个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面临的“怪圈”循环往复，导致解决复杂难题的长期努力变成了“救火”的短期行为，极大限制了全球治理的效能。

### （二）世界卫生组织统筹协调能力有待提升

我们都知道，世界卫生组织是联合国下属的一个专门机构，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协调中枢，是国际上最大的政府间卫生组织，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其主要职责是，监测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卫生、疾病和传染病情况，制定公共卫生标准，为世界各国提供建议和指导，协调和推动世界各国开展卫生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或遭受重大疫情的国家提供医疗援助，等等。截至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共有194个成员国。

这次疫情发生后，世界卫生组织及时收集、汇总和发布信息，总结和推广全球抗疫经验，推动相关国家加大疫苗和药物研发工作，在全球阻击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功劳我们不能忽视。但是，由于疫情来势迅猛，发展超乎想象，世界卫生组织呈现出统筹协调能力不强、无法协调全球力量、资源和手段的局面。

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只是一个协调机构，决定世界卫生组织权限的是所有成员国，特别是世界主要大国，这就需要国际社会有基本的共识和一致行动，而这一点非常之难。

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的严重程度是不一样的，其国家安全议程的议题也是不一样的。在本质上，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不仅仅是一项技术合作，因为它涉及所有成员国，而各个成员国的发展程度特别是价值观念不一样，合作并不容易；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也是一项政治合作，必然面临复杂的利益博弈和政治挑战。此外，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还涉及国际话语权问题。西方国家希望继续把持在全球治理重大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而众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大国，享有的话语权则很有限；发达国家不希望看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当然更不愿意看到它们发挥主导作用。因此，它们对于现有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改革一直犹豫不决，甚至形成巨大阻力。

世界卫生组织还面临财政困难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的财政收入有两个渠道，一是按照各成员国的人口和财富而计算出来的认缴会费，二是资源捐款。受限于联合国组织会员国会费的“零增长原则”，世界卫生组织的认缴会费一直未有大幅增长，一些大国（如美国）也一再拖欠会费。世界卫生组织没有足够的经费，导致它越来越依赖资源捐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一些大的捐助者，因此也无法有效解决不断增加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比如，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被指责勾结跨国制药巨头，夸大了甲型流感的危害和影响。

### （三）部分西方大国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意愿和能力显著下降

我们并不否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主要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他们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医疗卫生援助。196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正式成立，其宗旨之一就是鼓励和协调成员国为援助发展中国家作出努力，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经济状况，促进非成员国的经济发展。

我们还记得，2014年西非暴发埃博拉疫情后，中国第一时间给西非多个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派遣了大批医疗人员；同时我们也要知道，当时美国在协助西非抗击埃博拉疫情的战役中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动员西方世界的力量参与疫情防控方面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

但是，最近一些年，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及国内问题的增多，一些发达国家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思潮日益凸显，对全球治理投入的意愿降低或能力下降，无助于全球“治理赤字”的解决。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一直高举“美国第一”的口号，强调万事以美国利益为先，不愿意承担应有的大国责任，甚至不断“退群”“毁约”，给全球治理带来重大负面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先是隔岸观火、袖手旁观，而后傲慢自大、疏忽大意，导致疫情很快殃及自身，给美国经济造成重大打击，数以千万计美国人失业，形成空前失业潮。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还不断攻击世界卫生组织，说它披露信息不及时，甚至声称要暂停甚至取消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这是非常愚蠢的。

### （四）国际社会对人类安全的认识严重滞后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继续深入发展，但各种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也在不断显现，各种形式的全球治理危机给人类带来新的严峻挑战。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再次表明，人类社会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但是，在诸如卫生、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增长的时

候，国际社会很多国家特别是个别西方大国，仍然抱着传统的地缘政治老观念，继续强化传统的结盟体系，仍然聚焦于传统的大国竞争；对非传统安全特别是全球公共卫生关注不多，投入不多，所做的行动更加有限。比如，美国一直在国际上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2017年12月18日，美国白宫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传统大国积极与美国争夺地缘政治主导地位，并试图塑造不符合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世界秩序，美国在多个领域正受到排挤。这是近年来美国第一次把来自传统大国的威胁置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之上，标志着美国国家安全认知发生了重大变化。

其实，世界各国都应认识到，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大国间虽然其利益和观念存在分歧，甚至在某些领域还存在严重对抗，但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变得微乎其微。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传统政治也就是我们说的“高级政治”议题，其重要性已经显著下降，而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即“低级政治”议题的重要性显著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为，此次疫情的全球蔓延已经说明，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再是大国之间的相互摧毁，而是人类与病毒的战斗。因此，国际社会必须改变过时的旧观念，树立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

### 三、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需要理念，需要共识。在这个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及时向世界发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个新的合作理念是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体系，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升华，也是中国以实际行动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价值的生动体现，其意义重大。理解和领会这一新的理念，需要强调以下三个方面：

### （一）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抓住了人类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扎克（Mark Zacher）写过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因病相连：卫生治理与全球政治》。作者称，冷战结束后，全球范围内的传统安全威胁，比如核战争、化学战等得到缓解，但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一种人类以往从未想到过的方式竟使全球相互关切和连接起来，这种方式就是疾病和卫生。

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面临了数次重大疫情冲击，包括2003年SARS疫情、2009年甲型H1N1流感、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征、2014年埃博拉疫情、2016年寨卡疫情，以及2019年底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任何一种传染性疾病所威胁的都是不分国别、地域、种族、人群的全人类。这种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具有“扩散的跨国性”“威胁的普遍性”“治理的多国性”等非传统特征，每一次突发疫情都是对当事国卫生治理体系和全球卫生协作机制的严峻考验。此时，不同政见的国家之间也会暂时搁置争议，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人类社会已进入全球化时代，我们需要用一些新理念、新倡议打破东西方的划分，超越南北方的差异，越过意识形态的鸿沟，包容历史文化的不同，真正为这个赖以生存的星球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再次向我们证明，人类在健康问题上已经命运与共，健康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大公约数，是利益与道义最紧密的结合，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因此，我们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重要领域以及重要基础就是从全球公共卫生健康领域入手，逐步去推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基础和必然路径。

### （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丰富和完善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多次演讲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并付诸政策实践。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提出重大倡议，呼吁国际社会树立“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在2015年9月的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和2017年1月的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发出强烈呼吁，有力地传播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反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式形成并开始走向世界，其实施方略是一个“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作了集中的阐述，即“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涉及政治、安全、发展、环境等各个方面。进一步展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有“五个反对”和“五个要”。

#### “五个反对”和“五个要”

- 第一，政治上反对强权政治，要树立建设伙伴关系的新思路；
- 第二，安全上反对零和思维，要营造各国共享安全的新局面；
- 第三，经济上反对单边主义，要开创世界共同发展的新前景；
- 第四，文化上反对文明冲突，要形成不同文明包容互鉴的新气象；
- 第五，生态上反对以邻为壑，要倡导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

其实，“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就是中国一贯倡导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这里的“共享安全”自然包括生命健康安全，需要各国携手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在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断增多的新形势下，凝聚全球之力打造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共同防御重大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和挑战，维护世界普遍安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紧迫任务。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宏大的愿景，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世界的前进方向，是对未来的展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历双边、地区到全球的阶段性发展，应当分领域、分步骤、分阶段地予以推进。在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我们提出了“周边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等理念，这就是我们从不同的地域开始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实现打造的一些示范效应，打造一些榜样和典范。

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提出,就是呼吁国际社会从卫生健康领域出发,培育国际共识、增进国际互信、加强携手合作、不断积累共识,从而为最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基础。所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

### （三）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新的伦理规范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出现了一些有悖于人类理性文明的各种言论,诸如“中国病毒说”“中国阴谋论”“中国道歉论”“侵犯人权论”等荒谬论调不绝于耳、层出不穷。这些言论中,有的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自大,有的是基于旧的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有的秉持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思想,有的坚持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这些“政治病毒”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背道而驰,比疫情病毒的危害更为严重,我们必须加以抵制。

生命健康权无国界、无种族、无关社会发展水平。尊重世界各国各族人民的生命健康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应有之义。因此,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倡议展现了中国对全世界各国人民平等的生命健康权等基本人权的尊重,在摆脱政治制度差异、超越意识形态分歧、推进全球政治民主化和文明发展等方面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理念和中国智慧,为世界贡献了新的伦理精神,为中国赢得了国际道义。

对抗这次重大疫情,我们有了新的价值理念和伦理精神。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 四、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基本路径

### （一）不断改革和完善全球公共卫生多边合作体系

过去几年来,为推动全球治理,中国一直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呼吁打造更加公平、公正、合理、高效的多边合作机制。

就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而言,它的核心中枢是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国际上

最大的政府间卫生组织；联合国其他机构，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妇女署、难民署等，也能在全球公共卫生事业中发挥作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IMF）等金融机构，也能通过经济和物质上的救助来协助推动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另外，G20等国际多边组织也能通过首脑会议发挥沟通和促进作用。

2020年3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20个国家讨论如何携手合作，倡议凝聚共识，具有风向标的意义。当然，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还包括各个层面的区域组织，如欧盟、非盟、东盟、东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这些区域组织也能在各自的地区发挥不同程度的协调作用。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协调中枢是世界卫生组织。因此，如何推动世界卫生组织的改革和完善，充分发挥这个组织的作用，是最为关键的议题。其重点有4个方面：一是加强对重大突发传染性疾病的监测水平；二是加强对重大突发性传染性疾病的应对和处理能力；三是加强对世界各国抗击疫情的统筹协调能力；四是加强对医疗卫生发展事业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支持能力。比如说，在支持一些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时，社会组织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怎么去协调全球资源支持这些国家的公共卫生事业？这就是世界上对社会组织的期待。

长期以来，世界卫生组织也在思考如何改革与完善自身的重大问题。2019年3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对外公开了该组织成立以来最广泛的一次改革计划，以期达成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权威领导机构能够更加有力和高效发挥作用的目标。时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称：“世界已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寻求变革，改变世界卫生组织的DNA，才能满足当今世界对我们的期望，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让所有人享有可达到的最高健康水平。”这里谭德塞博士说的“改变世界卫生组织的DNA”，就是指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使世界卫生组织的运转更加高效、更加合理，更有能力去面对世界上不断增多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当

然，这里主要说的是全球公共卫生问题。

此次改革目的是向各国提供支持，为此，世界卫生组织推出了宏伟的“三个十亿”目标：全民健康覆盖受益人口新增10亿人；面对突发卫生事件受到更好保护的人口新增10亿人；健康和福祉得到改善的人口新增10亿人。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今后五年战略计划的核心内容。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世界卫生组织着手建立和强化新的组织架构，并形成四大支柱：

一是规划支柱，负责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实现全民健康覆盖和增进人口健康方面的工作；二是应急支柱，负责社会组织在应对卫生危机和帮助各国防范卫生危机方面的重大卫生安全工作，如何应对重大突发性传染性疾病就属于应急支柱的工作；三是对外关系和理事机构支柱，负责集中开展和协调世界卫生组织在资源调动、宣传交流方面的工作；四是业务活动支柱，用于确保该组织更专业化地履行在预算、财务、人力资源和供应链领域的重要职能。

除了这四大支柱外，世界卫生组织还在日内瓦总部设置首席科学家部门，目的就是加强世界卫生组织的核心科学工作，并确保世界卫生组织规范和标准的质量以及一致性。世界卫生组织如果受到一些大国特别是西方大国的掣肘，受到一些成员国利益不一致的掣肘时该怎么办？那就应该集中调动全球范围的科学家，建立一个科学家的共同体或联盟，让他们集体行动，集体呼吁。

当然，国际体系在本质上是一个无政府的体系，没有统一的中央政府、中央权威，决定国际议程的最根本上是所有的成员国。国际组织是没有主权的，其本质就是个协调机构，不能凌驾于国家之上，不可能对国家发号施令，必须依据所有成员国的授权而行动。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不是超级总统，没有决策的权力。重大决策由谁做出？由所有成员国，这就涉及成员国间的协调、沟通和合作，其间必然有利益分歧，这就是困难之处。想要国际组织解决所有的全球治理问题，是不现实的。但是，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里，在各国都重视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为了让这个世界更加有秩序，

我们确实需要一些国际组织来加强统筹和协调。而且，国际多边组织也确实是协调各国开展集体行动的最好载体和平台。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全球公共卫生多边合作体系，这是推动全球治理有效路径之一。

## （二）加强全球联防联控国际合作

2020年3月，以色列年轻历史学家、全球畅销书《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在中文刊物《三联生活周刊》和英文刊物美国《时代周刊》中发表了署名文章，谈及他对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的认识。赫拉利认为，流行病真正的解药不是隔离，而是合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赫拉利不是反对各国采取限制人流的措施，也不是反对各国采取的“封城”“封国”的办法，他想表达的意思是，各国必须建立共识，加强协作与团结，而不是相互猜忌、相互指责、各行其是。因此，他在文章中发出警告：“如果这场疫情带来的是人类之间更为严重的不团结和不信任，那将是病毒的最大胜利。”因此，全球联防联控很重要。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重大传染性疾病有时不是一国所能解决的内部问题，而是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需要有全球统一行动，也就是联防联控国际合作。面对疫情全球蔓延的态势，中国一直呼吁各国应该抛弃政治分歧、地域偏见和种族歧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互谅、互信、互爱。那种把病毒与特定地区、国家或种族联系起来的做法，削弱了国际社会抗击疫情的共识，阻碍了国际社会抗击疫情的共同行动，理应受到世界人民的共同反对。

在过去的历史中，人类在应对重大疫情的时候也有一些合作及共同行动，我们要总结历史经验。比如说，2014—2015年第一轮埃博拉疫情暴发后，全球的反应非常迅速，数万名医疗人员、科学家、研究人员、开发者、志愿者汇聚于西非国家。众多药品及医疗物资生产商也参与其中，向现场聚集的近4000多名世界各国的医疗技术人员和全球45家实验室提供了研究支持。这次全世界的共同行动为当时有效防控埃博拉疫情的扩散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

### （三）世界大国需要发挥大国责任担当

世界大国是有责任、有担当的，要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必然要给全世界贡献应有的力量。世界各国受疫情波及程度不同，防控能力大小有别。因此，需要各国在资金、医疗物资和诊疗技术上相互协助，在防控政策上相互合作。世界大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对更高，卫生医疗水平相对更好，在防治重大疾病等方面也积累了相对更多的经验，不仅有能力、有条件支持全球公共卫生多边机构的发展，在协调全球行动中发挥引领作用，还能帮助“穷国”“弱国”提高疾病防控能力。

我们所说的世界大国，不仅指美国这样的传统大国，也包括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大国。早有学者指出，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不断发展，医疗技术不断提高，他们在构建国际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进程中，有望担负起重要的历史使命，这也是全世界人民对这些国家的期待。如果这些国家要想在世纪舞台特别是全球治理领域中有更大的声音与威望，自然需要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大的能量。

最近，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推出了题为《新兴大国与全球卫生治理：以金砖国家为例》的新书。该书作者认为，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大国，包括金砖国家在制定全球公共卫生议程方面不断努力，同时在外交领域采取了相应的政策和举措，构成了对现有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有效补充。该书作者还对新兴国家在未来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中的角色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认为在现有国际框架内，这些国家所发挥的作用虽然是有限和受制约的，但未来他们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 （四）建立科研攻关的新型国际合作机制

全球公共卫生健康水平的提高，一靠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二靠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医学技术的发展。人们有了更好的生活工作条件，有了更好的卫生设施，自然就能更好地提高全球公共卫生健康水平。人们需要更好更快的检测手段和更有针对性的药物和疫苗，就需要建立科研攻关的

合作机制并实现重大突破。

据估计，在20世纪的100年内，总共约有3至5亿人死于天花。到了1967年，据国际卫生组织的数字，当年仍然有1500万人感染天花，当中200万人死亡。此后10年，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推动下，全球接种天花疫苗的运动非常成功。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已被人类彻底根除，到2019年已经没有人再感染或死于天花。这就是人类在科研攻关上实现突破后，给全球公共卫生水平带来大幅提高的一个成功案例。因此，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需要强化科技支撑，加快推动溯源、药物、疫苗、检测等方面的研发合作，尽快实现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全面提升体系化对抗能力。

#### （五）鼓励世界各国的民间力量积极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除了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国际多边合作组织外，国际社会的各种民间团体、NGO、个人等民间力量也能参与其中。如果我们把这些力量和行动都汇集到全球公共卫生事业中，就会壮大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队伍和能力。这里面有两位我们非常熟悉的杰出人物：美国的比尔·盖茨和中国的马云。

2000年，盖茨夫妇创立了“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致力于在全球推广卫生和教育项目，时下已经成长为美国规模最大的民间慈善机构。盖茨早已许下承诺，会把总计市值为580亿美元的个人资产悉数捐给慈善基金会。过去一些年，他不遗余力地奔走在非洲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致力于让非洲贫苦人民用上干净的厕所，让非洲民众免于疟疾的折磨，让非洲的孩子免于脊髓灰质炎的病痛。奥斯卡获奖导演戴维斯·古根海姆感动于比尔·盖茨的行动，专门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走进比尔：解码比尔·盖茨》，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实的比尔·盖茨：他热爱他的微软帝国，但他更执迷于慈善事业；他希望拯救世界的穷苦人民，但在一次次的挫折与失败后仍然坚持，继续为世界的福祉而努力。这是一种慈善精神、人道主义，这对全球治理非常重要。



2010年5月，在马云的倡议下，阿里巴巴集团宣布从2010年起将集团年收入的0.3%拨作公益基金，成立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2014年12月，“浙江马云公益基金会”正式成立，这是马云个人出资在国内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以“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为宗旨，以“让天更蓝、水更清、身体更健康、思想更阳光”为使命。

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暴发之时，马云公益基金会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在1月29日宣布，捐赠1亿元用于支持冠状病毒的疫苗研发。此前阿里巴巴集团也宣布，设立10亿元医疗物资供给专项基金，用于国内抗疫。当疫情在全球大暴发之后，两个基金会又采取积极行动，向全世界遭受疫情冲击的多个国家捐赠口罩、检测试剂盒、防护服、防护面罩和呼吸机等医疗物资。而且，疫情以来马云公益基金会所有用于国内以及国外140多个国家抗疫公益事业的资金，全部来自马云的个人捐赠，没有动用一分钱的社会募捐资金。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是一个多层面的、立体的体系，既有全球维度的多边合作体系，也有各个主权国家特别是大国，还有多种形式的民间社团和个人的力量。我们看到，民间有热情、有力量参与全球公共卫生事业。那么，我们当然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充分发挥民间社群在提供技术合作、物资援助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等方面所展现出的力量。这将有利于推动国际公共卫生治理的进步和全球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 五、中国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重要贡献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虽然中国本身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国民整体水平来看并不富裕，但是中国从来都是世界发展援助的大国。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为世界各国的人民，尤其是为弱势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提供长年的、大规模的、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

事实上，中国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的参与和支持，并非始于今日。从1963年起，中国已经无私地向69个国家提供医疗援助，累计派出医务人员2.1万多人次，诊治病人达2.6亿人次。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国援非医疗队。自1968年派出第一批36人医疗队至今，50年来已累计向非洲11个国家和地区派出51批援外医疗队，医护人员达949人次，其中有11人将生命永远留在了受援国。中国援非医疗工作以“一对一”的方式，即中国一省对非洲一国进行帮助。在艰苦的条件下，一批批援外医疗队员几十年如一日，不仅救治伤病，还为受援国培养了大批医务人员，结下了深厚友谊，并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有时候我们感叹，中非关系为什么这么好？在一些重大国际场合，为什么我们总是得到了像非洲这种发展中国家的大力支持？就是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一直携手非洲国家前行。最初中国是非洲国家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同志和战友；现在是非洲发展建设进程中最可靠和最真诚的合作伙伴。今天有些人对中非合作和中国援助非洲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支持他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医疗卫生事业等等各方面的发展，是因为帮助非洲也是帮助我们自己。

第一，中国在政治上需要协作合作，在国际大舞台上我们仍然需要非洲国家的支持和帮助。第二，目前中国不光是“请进来”，还要大规模“走出去”。2012年，非洲华侨华人的估计数达到110万。我们的人、企业、资产广泛分布于非洲大陆。非洲安全，我们也会更安全；非洲发展得越好，我们的发展机遇也会更加宽阔。我们处在一个高度互联互通、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中，要以更加宽阔的胸怀、眼界去看待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包括对国际社会的援助。

2014年西非暴发埃博拉疫情时，中国在国际社会率先对西非国家开展了大规模援助，创下三个“第一”：第一个向西非提供埃博拉疫情专项援助；第一个向疫区派出专家组和医疗队，指导并直接参加一线救治；第一个用专机运送医疗防护物资，使援助物资在第一时间运抵疫区并迅速分发使用。同时，我国还是累计向非洲提供援助批次最多和医疗物资最多的

国家之一。

据统计，在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中，中国政府先后提供了4轮、总价值7.5亿元的紧急援助。而且，我们不仅提供了物资援助，还累计派遣了1000人次的医务人员、公共卫生专家奔赴疫区一线，从事病例留观、治疗、实验室检测和人员培训等工作。直到目前，西非国家还有我们的医疗专家在实验室工作，长期跟踪研究、帮助协助这些国家去应对这种疫情。中国对非洲埃博拉疫情的援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卫生领域规模最大的一次援外行动。

中国古人有言：“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新时代的中国秉持正确的义利观，在对发展中国家合作中强调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真、实、亲、诚”的承诺。这份患难真情感动了非洲朋友，也得到了受援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

当时，素有非洲“铁娘子”美誉的时任利比里亚总统约翰逊·瑟利夫在发表电视讲话中，专门感谢中国对利比里亚的援助。2018年，世界前足球先生、利比里亚新任总统乔治·维阿在正式宣誓就职并发表演讲时，再次感谢中国的援助，称中国是利比里亚最可信赖的盟友之一。

2016年12月2日，塞拉利昂总统来华访问，在与李克强总理交谈时，他开篇就讲：“我这次访华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感谢中国政府在我们遭遇埃博拉疫情时对塞拉利昂给予的无私支持。”他说：“在塞拉利昂遭遇埃博拉疫情、最孤立无援的时候，是中国政府率先驰援，发挥了表率 and 带头作用，带动了国际社会纷纷向我们伸出援手。”当时，中国不仅援助大量物资和人员，还发挥了带头作用。这对全球抗击埃博拉疫情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今天，中国有更大的能力、更好的基础、更大的意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帮助。在这次与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斗争中，中国不仅以最全面、最迅速、最严格、最积极的抗疫防控措施为世界赢得了宝贵的防备疫情时

间，而且明确提出了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和国际合作倡议，以实际行动积极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主动承担了力所能及的大国责任。我们的行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倡议新的合作理念。**中国领导人明确提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国际合作新理念、新倡议，呼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强化国际合作共识，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打造理念基础。

**第二，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的发展和改革。**我们一贯的立场就是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的发展和改革。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第一时间接受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来华调研疫情防控情况。中国积极向世界卫生组织捐款捐物，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向与疫情相关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另外，中国也坚定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的机构改革，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其实，我们对全球治理的支持是广泛的。除了世界卫生组织外，我们对很多国际多边组织都有很大的支持。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我们要积极有为，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积极有为”就是我们在支持国际多边组织中能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提供更多的支持与力量。比如说，我们增加了联合国维和经费，也提高了在世界银行和IMF的份额。目前，中国在联合国常规预算经费中的分摊比例为12.01%，在联合国维和预算经费中的分摊比例为15.22%，均为第二大出资国。中国积极参加国际维和行动。自1990年以来，中国军队已先后参加2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军事人员4万余人次，是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军人最多的国家。这都是我们大国责任的体现。同时，我们在重大国际机制当中的话语权、影响力也在提高。

**第三，主动与世界分享信息和经验。**互通疫情信息是国际社会整体抗疫斗争的重要一环。信息和经验非常重要，能够为别的国家节省大量的探

索成本与时间。疫情发生后，中国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分享了病毒基因序列信息，及时向有关国家和地区通报疫情，发布多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和防控方案，相继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举行视频会议，交流疫情防控和诊疗经验，共同提升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能力。因为中国知道，互通疫情信息，分享抗疫经验，有助于各国科学防控疫情，增强世界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决心。

**第四，积极提供力所能及的对外援助。**这次疫情以来，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在全力抗击本国疫情的同时，克服自身困难，向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派遣医疗专家团队，提供药品等防疫物资援助。当前，全球仍在紧张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非洲大陆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声明》指出，我们对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尤其是非洲和小岛国，面临的严峻挑战深表关切。而加强非洲卫生防御是提升全球卫生防疫韧性的关键。非洲大陆有13亿人口，医疗技术又相对落后，如果这个地方发生严重疫情的话，情况可能会非常复杂和严峻，对全世界的影响也将是巨大的。正如非洲多国驻华大使指出的，中国始终站在驰援非洲的最前线，非洲几乎每个地方都收到了来自中国的援助，不仅包括防护服、护目镜、体温检测仪、口罩等援助物资，还有中国专家组。

**第五，为全球生产急需的医疗卫生物资。**中国是“世界工厂”，可以为世界提供大量的生产物资。在医疗卫生物资方面，我们也是有能力生产的。在疫情冲击下，世界多国医疗防护物资告急，同时也相继颁布医疗物资出口禁令，一些国家甚至拦截他国医疗防护物资。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多家企业纷纷伸出援手，向世界急需医疗物资的国家出口了大量的医疗物资。这也是我们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的极大支持。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在有效防控国内疫情的同时，高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旗帜，积极推动国际社会联防联控，在推动国际公共卫生合作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为推动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贡献了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 总 结

在此次全球抗疫斗争中，中国正以实际行动表明，中国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是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疫情终有一天会结束，但它留给人们的警示不会就此结束。要守护全球 70 亿人民的生命健康，国际社会必须在思维上进行转变，在观念上与时俱进，在行动上有很大的团结合作，建立起更加完备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以应对各种长期的或突发性的全球公共卫生状况。

2019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发表题为《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面对严峻的全球性挑战，面对人类发展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抉择，各国应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积极做行动派、不做观望者，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国际社会要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为引领，真诚加强团结、深化合作、密切协调，不断提升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水平，不断提高全球人民的共同福祉，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根据“学习中国”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文韬 钟雪 侯欣

#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是否会成为中国经济地位上升的契机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梅新育

**摘要：**新冠疫情冲击是否会成为中国经济地位上升的契机？这个问题如果放在疫情刚暴发的时候，可能是世人难以想象的。但是，在这场疫情暴发之初，我就坚定地相信，中国不仅能够经受住这场疫情的考验，而且完全有可能通过这场疫情的冲击而凤凰涅槃，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江湖地位”更上一层楼。

**关键词：**新冠疫情；经济；中国奇迹；“脱钩”；全球化

新冠疫情冲击是否会成为中国经济地位上升的契机？这个问题如果放在疫情刚暴发的时候，可能是世人难以想象的。但是，在这场疫情暴发之初，我就坚定地相信，中国不仅能够经受住这场疫情的考验，而且完全有可能通过这场疫情的冲击而凤凰涅槃，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江湖地位”更上一层楼。

文章主要阐述以下几方面内容：一、竞争对手的期望：“脱钩”是核心，新冠肺炎疫情终结“中国奇迹”；二、疫情对“脱钩”影响的三种结果；三、中国遏制“脱钩”的基础；四、创新增强了中国遏制、逆转“脱钩”的底气；五、疫情“全球化”：危机应对，高效者胜；六、疫情“全球化”有可能提升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

## 一、竞争对手的期望：“脱钩”是核心， 新冠疫情终结“中国奇迹”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2020年1月末这场疫情刚刚暴发的时候，我



们的竞争对手或者把我们视为头号竞争对手、最热切期望赶超中国的那些国家的势力，他们期望外部市场与“中国制造”“脱钩”，希望新冠疫情的冲击能够终结“中国奇迹”。当时，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的言论。他说，“新冠疫情将刺激供应链离开中国而回流美国”。其次，Bard 大学外交与人文科学专业 James Clarke Chace 讲席教授沃尔特·罗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且之后发展成为一场外交事件。这篇文章的开头就说：“因为某种蝙蝠病毒，犹如不可阻挡的重型卡车——中国这周消停了，尽管中国当局努力控制疫情并重新开始发展经济，但这个正逐渐习惯了中国势不可挡崛起的世界，正提醒人们，没有什么东西——包括中国的实力（崛起）——是可以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从这些话可以看出美国许多精英的欣喜之情，期望外部力量、病毒可以阻挡中国的上升。那么，新冠疫情是否会导致“中国制造”与外部市场“脱钩”，是否会逆转、终结中国崛起的奇迹呢？当然，这种风险确实是客观存在的。

## 二、疫情对“脱钩”的影响有三种结果

第一，“中国制造”与外部市场加速“脱钩”；第二，“中国制造”与外部市场“脱钩”的趋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第三，中国有效逆转了“中国制造”与外部市场“脱钩”的趋势。

### （一）什么情况下将加速“脱钩”

我认为如果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的组合，那么外部市场与“中国制造”加速“脱钩”将是不可避免的结局。第一，“中国制造”的可替代性很强；第二，新冠疫情的冲击仅仅局限于中国境内，不会传染到别的国家；第三，中国应对新冠疫情的冲击旷日持久，疫情久久不能平息；第四，其他国家和地区控制新冠疫情的行动能力、意志与中国一样，甚至比中国更强；第

五，中国控制新冠疫情的超强力度是过度的，也是不必要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佛系”措施足以有效应对。如果上述五种情况同时出现的话，那么外部市场与“中国制造”加速“脱钩”将是不可避免的结局。进而，中国崛起的进程将遭到重挫，“中国奇迹”有可能以此为转折点而发生大变化。

## （二）什么情况下“脱钩”会遭到有效遏制

如果出现以下三种情况的组合，外部市场与“中国制造”“脱钩”的趋势将会遭到有效的遏制：第一，“中国制造”难以替代；第二，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有效遏制住了疫情的蔓延与恶化；第三，中国较快地实现了全面复工。

## （三）什么情况下可以逆转“脱钩”

在有效遏制“脱钩”的三种情况之外，还需要再增加三个条件，便可以逆转“脱钩”。第一，疫情的冲击激励了中国经济与技术创新，这是最根本的一条；第二，疫情“全球化”。也就是说，新冠肺炎大规模流行，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对其他主要经济大国，以及把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的国家同样产生了重大冲击；第三，其他国家和地区控制新冠疫情的行动能力、意愿、效果都明显落后于中国。当有效遏制“脱钩”的三种组合情况以及上述三个条件同时出现的话，外部市场与“中国制造”不仅无法“脱钩”，反而会因为这场新冠疫情的冲击而逆转，进一步更多地依赖“中国制造”。从目前的发展来看，我们已经有非常大的把握实现第二种结果。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有效地遏制“脱钩”。而且现在看来，我们经过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第三种结果——逆转“脱钩”的希望越来越大。

## 三、中国遏制“脱钩”的基础

当前，我们有底气说可以有效遏制“脱钩”的基础是：第一，“中国制造”难以替代。近年来，由于中国的土地、人工等生产要素的成本提升

了，所以中国的一些产业会流失一些订单，这些订单会转移到别的国家，如越南、印度以及其他后发的发展中国家。而且，一些高新技术产业也会停止向中国流动，回流到发达国家。这种情况是非常流行的，特别是在金融市场，很多投资者、机构、分析师都赞成这样的看法。但是，在2020年2月的前20天，也就是我们与新冠疫情斗争最激烈、最艰苦的时候，外部市场、国际金融市场照涨不误，海外股市也照涨不误，只是在大年初一武汉“封城”和全中国进入全民抗疫的时候，海外股市主要是美国、欧洲、日本才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事实上，2020年1月末到2月的前20天，海外股市一直在上涨，而且涨得还挺厉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的很多分析师就解释为，这是欧美市场、西方市场完成了一次与“中国制造”“脱钩”的压力测试。也就是说，我跟你“脱钩”，照样经受得起，照涨不误。但是，从很多企业那里发现不是这么回事。相反，因为这场疫情的冲击，国内的消费需求、市场迅速冻结了、休克了。但是，海外订单只有少量减少，因为没有可替代的供货来源。实际上，很多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鞋子、服装等，近几年它们的生产从中国转向东南亚、南亚国家之后，已经引起了很多西方消费者的抱怨。消费者说，品牌还是原来的品牌，之前“Made in China”的时候质量很好，现在变成“越南制造”“孟加拉国制造”了，质量明显不如“中国制造”。在交货期等方面，与“中国制造”时期相比，销售商们有着截然不同的体会。所以，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来看，自2018年美国对我们发动“贸易战”至今，其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绞杀”下的功夫是最多的。但是，不管怎么“绞杀”，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还是照样发展。

第二，从更高层次来看，“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并不是单纯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优势，而是来源于一个包罗万象的庞大系统，它是所有因素组合而成的。

一是我们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能够容纳所有种类的产业配套，实现有效的规模效益、范围经济。

二是我国的劳动者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有文化、有纪律、有勤奋精神，这是无可比拟的。

三是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多方面在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的。

四是我国的公共服务在全世界是相当领先的，而且越来越好。

五是我国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这是2008年次贷危机暴发前后我们就已经取得的成就。十几年过去了，这个“唯一”的地位不但没有削弱，反而越来越巩固。相应地，很多产业发展需要的配套产品，在中国可能打几个电话就能够完成，但迁到国外的话，可能跑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不一定能搞定。这就能看出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可能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的10倍。一些外资企业认为，如果到别的发展中国家设厂生产，发展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话，岂不是更有竞争力？结果真搬过去后，先不说电、水、交通等，光是劳动力就让他们哭笑不得。如果再加上效率因素的话，中国劳动者的工资比他们高20倍，但照样比他们有竞争力，效率也高得多。

第三，我国的抗疫实践也向全世界显示，我们在较短时间内就有效地遏制住了疫情的蔓延、恶化，复工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而且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这是我们能够有效遏制“脱钩”的基础。

#### 四、创新增强中国遏制、逆转“脱钩”的底气

当前，疫情冲击已经刺激了中国经济、技术的一系列创新，创新又可以被称作“破坏性创造”，很多创新都是在应对重大挑战、重大冲击的过程中产生的。原因如下：

第一，如果没有重大挑战、重大冲击，对创新的需求不能够凸显出来。

第二，很多时候创新之所以无法萌芽，或者说萌芽之后不能成长，主要是由于传统、守旧、垄断性势力的排挤抑制了创新的成长。但在重大挑

战的冲击之下，传统的、保守的、垄断的势力被打破了，创新就会主动茁壮成长起来。在这里，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同样是重大挑战、重大冲击，发生在不同的国家，所带来的影响可能是截然相反的。假如重大挑战、重大冲击发生在一个经济发展条件较差、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很低，甚至连最基本的和平安定都无法保证的国家，不仅不能带来创新，还会进一步摧毁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但是，如果重大挑战、重大冲击发生在这样一个国家——有着和平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人民勤奋、富有智慧、拥有自我奋斗的精神；有经济社会发展所必要的软硬基础设施，而且都比较完备；法律法规等制度不僵化，能够让创新成长起来。这时，创新就会被激发出来并主动成长。

这里举一个例子：2003年，中国遭遇了“非典”（SARS）疫情。当时，我国的经济数字惨不忍睹。但是，当年我们的经济增长率不仅赶上来了，而且比上一年的增长率更高。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非典”疫情的冲击极大地刺激、推动了一系列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的成长。那时候，电商在中国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新生事物。当时，我国的电子商务是完全从美国引进的，与美国的差距非常大。但是，现在中国的电子商务在全球是遥遥领先的。我们拥有一大批全世界最优秀的电商企业，很多美国企业还要来中国学习我们的电商模式。可以说，2020年因新冠疫情的冲击，已经刺激了中国经济技术领域的一系列创新。当然，有些创新还没有报道出来，日后完全有可能成长起来。这些在疫情冲击下产生的创新，未来完全有可能成长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参天大树，我对此非常有信心。

## 五、疫情“全球化”：危机应对，高效者胜

如今，新冠疫情已经全球化了，中国之外已经成为疫情蔓延的主战场。重大冲击对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及国际地位的影响，在不同情况下效果是不同的。如果一场重大冲击仅仅发生在一个国家或者两个国家，那可能只

有一个国家为此付出代价，另外一个没有付出代价，第一次蒙受的就只是净损失，除非国家的组织体系在这场冲击中实现了非常大的效率提升，否则的话，这场重大冲击注定会导致该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下降。但是，如果重大冲击蔓延、波及众多国家甚至全球，那么这样的冲击就会加速推动应对疫情高效有力的国家脱颖而出，这个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也会随之上升。在历史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类似的情况。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就有这种现象，如果美国暴发了金融危机，且仅仅局限于美国国内的话，那么国际资本就会逃离美国，流向其他地方，致使美元贬值，美元资产遭到抛售。如果这场金融危机蔓延到了全世界，发展成为全球性的经济金融危机，其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国际资本就不是逃离美元，而是逃向美元。在次贷危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就看到了这一点。次贷危机刚刚暴发的时候，只是美国国内的金融危机，美元贬值，国际资本逃离美国，当次贷危机发展成全球化的金融危机时，相对于欧洲、日本，美国在全球的地位反而进一步提升了。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美国的效率、危机应对比欧洲表现得更坚强有力、更有效。那么，这一次新冠疫情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 新冠疫情“全球化”的表现

新冠疫情尽管首先是在中国大规模暴发的，但是现在已经全球化了，而且是非常充分地全球化了。截至2020年3月8日，已经有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出现了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几乎涵盖了全球所有的政治经济大国、区域经济大国。值得关注的是，根据科学研究，中国是最早大规模暴发新冠疫情的国家，但不一定是新冠肺炎的起源国。像意大利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虽然此前没有大规模暴发疫情，但是从相关研究来看，在中国暴发新冠疫情之前，新冠病毒可能已经在这些国家传播了。

现在，新冠疫情的主战场已经转向海外，不再是中国了。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截至2020年3月9日24时，中国累计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例总数大约是海外国家总数的2.6倍，仍然是病例数量最多的国家。但是，如

果从每日新增病例数量的变化趋势来看，海外国家新增的确诊病例增长势头已经远远超过中国了。我整理了2020年2月21日到3月10日海外和中国新增确诊病例的变化情况（见图1）。

中国及海外每日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日期	海外		中国			
	新增确诊	新增疑似	新增疑似	鄂外新增确诊	境外输入确诊	境外输入确诊累计
2.21	21	397	1361	31		
2.22	485	648	882	18		
2.23	239	409	620	11		
2.24	491	508	530	9		
2.25	365	406	439	5		
2.26	506	433	508	24		
2.27	913	327	452	9		
2.28	993	427	248	4		
2.29	1468	573	132	3		
3.1	1250	202	141	6		
3.2	1890	125	129	11	7（浙江）	
3.3	2372	119	143	4		
3.4	1839	139	143	5	2	20
3.5	2292	143	102	17	16	36
3.6	3629	99	99	25	24	60
3.7	3339	44	84	3	3	63
3.8	3745	40	60	4	4（甘肃）	67
3.9	3756	19	36	2	2	69
3.10	4828	24	31	11	10	79

图 1

在疫情暴发初期，如2月15日，海外新增确诊病例10例，中国当日新增确诊病例2008例，比海外当日新增确诊病例多出了将近200倍。但从2月26日到3月10日，海外每日新增的确诊病例数量一直高于中国，而且超出的幅度日益扩大。具体情况为：从3月2日起，海外新增确诊病例是中国的10倍以上。到3月10日，中国新增确诊病例24例，而海外新增确诊病例为4828例，是中国当日新增确诊病例的201倍还多。可以看到，2月15日，中国大陆的新增确诊病例是海外的200倍，3月10日，海外的新增确诊病例是中国大陆的200倍。由此可见，中国的新增确诊病例急剧减少，而且治愈速度快、数量多。

3月6日，中国的确诊病例为22177例，海外确诊病例为17569例；



3月8日，海外确诊病例超过了中国，为23309例，中国为19016例。截至3月10日24时，海外确诊病例达到30140例，中国的确诊病例减少到16145例，海外比中国多13995例，几乎多了一倍。

我们可以看到，海外已经成为新冠疫情蔓延的主战场。如果把30个主要国家的疫情数据整理一下，得出的结论是：有一批国家的疫情严重程度已经超越了中国，还有一批国家的疫情发展严重程度正在快速“追赶”中国。我制定了一个衡量指标——确诊率，即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占国家或地区总人口的比例，用这样一个指标衡量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疫情严重程度。中国的情况是这样的：3月9日，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754例，而且确诊病例的增长接近终结。2019年末，我国的总人口是14亿零5万人，这样的话，确诊病例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是每万人中有0.58人确诊。按这个标准来衡量，海外主要大国、发达国家和区域战略核心国家按预警的严重程度可以划分为三档：

### **第一档：意大利、伊朗、韩国**

意大利、伊朗、韩国这三个国家的疫情严重程度已经超过了中国。按上述指标衡量，3月9日意大利的确诊病例是中国的2.62倍，伊朗是中国的2.5倍，韩国是中国的1.44倍。韩国的疫情已经基本上得到了控制，意大利和伊朗的疫情严重程度相对中国还会进一步提升。

### **第二档：瑞士、挪威**

瑞士和挪威的疫情非常严重，这可能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因为这两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非常高，在全世界名列前茅。而且，这两个国家的社会福利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被认为是非常好的。但是，他们的疫情确实非常严重。按照瑞士的总人口来计算，如果它的确诊病例达到496人，它的疫情严重程度就和中国相当了。事实上，到3月10日中午12时，瑞士的确诊病例已经有374人了。同样，按照挪威的总人口来计算，如果它的确诊病例达到311人，疫情的严重程度就与中国相当了。截至北京时间3月10日中午12点，挪威确诊病例已达到227人。

### 第三档：法国、德国、西班牙、英国、日本、美国等

法国、德国、西班牙、英国、日本、美国等国的疫情严重程度发展较快。按照人口总数计算，法国的确诊病例达到 3885 人，疫情的严重程度就与中国相当了。北京时间 3 月 10 日中午 12 时，法国的确诊病例已有 1412 人，还差 2473 人就赶上中国了。根据法国人这些天的表现：足球赛照踢照看、游行不断等等，我认为法国赶上这个指标（3885 人）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按照人口总数计算，西班牙的确诊病例达到 2722 人，疫情严重程度就与中国相当了。截至北京时间 3 月 10 日中午 12 时，西班牙的确诊病例是 1223 名。从西班牙的疫情发展情况来看，也是很有可能赶超中国的。

从报道出来的情况来，欧洲国家是新增、确诊病例数量增长最快的地区，而美国、日本的确诊病例数量却很少。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日本并不像中国武汉，对所有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应收尽收，他们有很多都是不检测的。3 月 11 日，美国的确诊病例人数破千。按照人口总数来算，美国的确诊病例达到 19140 人，疫情的严重程度就相当于中国了。

其他发展中国家确诊病例虽然很少，并不是这些国家的疫情不严重，而是这些国家根本没怎么检测，如印度，截至北京时间 3 月 10 日中午 12 时，其确诊病例只有 59 人，巴基斯坦确诊病例只有 16 人，孟加拉国确诊病例只有 3 人。我个人觉得，这些数字存在很大问题。在全球纺织服装市场中，孟加拉国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出口国，中国占全球纺织服装市场出口份额的 36%，孟加拉国大概占 10%。孟加拉国的国土面积为 14.757 万平方公里，并不是一个大国，人口却是非常稠密的，总人口数为 1.6 亿。而且，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卫生条件、工作环境并不是很好。如果新冠疫情在孟加拉国蔓延，该国的纺织服装产业、出口产业对国际市场的影响是很大的。又如埃及，一直以来埃及都没有报道有确诊病例，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不断出现去过埃及之后被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的病例。那么，埃及到底是病例很少还是根本就没有检测，需要我们关注。之所以要给予

埃及较多关注，不是因为埃及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当中有多大分量。事实上，埃及在国际经济当中所占的份额是非常低的。但问题是，苏伊士运河在埃及，它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国际贸易水道之一，是中国与欧洲的贸易、物流必经之地。而且，中国也是苏伊士运河最大的用户，如果新冠疫情在埃及暴发，会对苏伊士运河的航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对这样的风险要及早预估。

这样看来，我之所以不太看好别的国家，是因为大部分国家在应对新冠疫情的效果方面，跟中国政府是没法儿比的。光看防疫资源、物资条件，中国也领先于不少发达国家。在中国疫情大暴发、意大利也开始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时候，米兰权威医院的传染研究中心主任在新闻发言中说，这只不过是个“大号流感”，不会出什么问题，它在中国暴发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中国的医疗卫生条件比意大利差太远了！中国人的生活卫生习惯不好，不像欧洲人这么讲卫生。现在，她恨不得把自己的发言都删掉，她的发言体现了她的极度无知。她说中国的医疗卫生条件不如意大利，按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的床位数量来算，中国比意大利差不多多了一倍，2018年，中国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的床位是6.03张，同年，意大利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的床位是3.4张，差不多只比我们的一半多一点。另外，西班牙是3张、美国是2.9张、英国是2.8张、加拿大是2.7张、印度是0.7张，都不到我们的一半指标，这恐怕是大家都想不到的，但这就是现实。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欧美的医疗卫生条件、物资资源比中国强，其实未必如此。

2018年，欧洲发达国家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的硬指标低于中国，包括瑞士、卢森堡、斯洛文尼亚、希腊、奥地利、挪威、葡萄牙、芬兰、荷兰、爱尔兰、冰岛、丹麦、瑞典，这可能与大家想象的很不一样。事实上，中国在2010年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就达到了3.58张，2018年增长为6.03张。可以看到，大部分高福利的欧盟国家在2018年还没有达到中国2010年的水平。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说，新冠肺炎疫情还会继

续蔓延，海外疫情的严重程度最后超过中国是完全有可能的。

## 六、疫情“全球化”有可能提升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

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疫情冲击已经激励了中国经济与技术的创新。而且，疫情“全球化”也对其他主要经济大国和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的国家，正在产生或者很有可能产生重大冲击。然而，其他国家和地区控制新冠疫情的行动能力、意愿和效果明显落后于中国。由此可见，疫情“全球化”对提升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是不可想象的，而是很有可能实现的。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第一，把国内的事情做好。现在，首要的是在保证防疫安全的前提下，尽快实现全面复工，让我们的生产能够正常起来。3月，最不能拖时间的是农业生产、春耕春播。大家知道，工业生产没有时令的概念，但是农业生产一旦错过农时，就会耽误全年的生产。1月和2月，中国的气候状况是相当好的，降雨比较充沛，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也只是平常年份的1/10不到。因为雨雪解除了此前的旱情，土壤的状况非常好。如果没有新冠疫情，今年的丰产丰收应该是非常有希望的。但是，新冠疫情给我们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

现在，我们只有尽快实现全面复工，才能保持对全球制造业和货物贸易的控制力，同时，才有希望在疫情“全球化”且对外部世界造成更大冲击的情况下，发挥全球抗疫物资“军工厂”的作用，进一步逆转外部市场与“中国制造”“脱钩”的苗头，提升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实际上，这个发展势头在国际金融市场已经有所体现了。在中国疫情刚刚暴发、全国刚开始抗疫总动员的时候，海外股市连续暴跌了三天。但是从1月底到2月中旬，海外股市出现了上涨，合理的解释是外部市场认为中国能够有效应对这场冲击。3月初，大家的预期开始出现变化，认为中国的疫情正在走向结束，而欧美国家的疫情正在全面暴发。同时，欧美国家

还不一定能够像中国这样有效应对疫情，结果就是，摩根士丹利等大型国际投行把人民币资产列为安全资产，把美元资产列为风险资产。可以看到，A股跌得很少，甚至逆市上涨，但是，美股暴跌，股市震荡得一塌糊涂，以至于在3月8日夜里美股暴跌之后，我们的A股在3月10日反而出现上涨。因而，资本市场有很多人称2020年3月10日为“A股市场的独立日”，这里的“独立”指的是独立于外部冲击，能够走出自己走势的“独立日”。

第二，为了推动全面复工，我认为各地医疗卫生系统的工作重心需要迅速、及时地转向为复工服务。现在，我们需要把资源和精力用在为复工服务上。比如，我们现在已经有每周150万的检测能力了，而且这个能力还可能进一步提高。这样我们就可以为复工的企业员工提供健康检测，让企业放心地安排员工全面复工。与此同时，其他部门也应当为此作出相应的协调，开绿灯放行。另外，如何把抗疫与招商引资结合起来，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后，我们做了一些公益捐赠活动，与海外的华商朋友合作，开展募捐，在海外采购抗疫物资运到湖北，大概捐赠了几万只N95口罩、几千副手套以及防护衣等等。我查了一下，有100多万的海外抗疫物资分配给了湖北宜昌、鄂州、黄冈等城市。我把这些捐赠物资的组织以及宜昌、鄂州的地方政府领导组织起来，建了一个群，谈有关捐赠、对接、协调抗疫物资的事情。同时，我也跟宜昌、鄂州的领导讲，希望他们开动一下脑筋、拓宽一下思路，把抗疫与招商引资结合起来，因为这些捐赠方好多都是有实力的企业，跟他们在捐赠物资对接上处好关系，之后也许可以邀请这些企业到当地去投资。比如，一家中国医药集团在宜昌有好几家医院，如果宜昌的领导在这次抗疫物资的对接、协调上能与这家企业处好关系的话，这家医药集团很可能会增加在宜昌的医院的投资，甚至可能建设一个新医院，这就是一种增加的投资。所以说，在市场中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同时，我个人认为，在经济重启中，思维方

式需要调整一下，不能做得太过火。因为一些貌似有道理的、正确的做法，恐怕是对经济和社会活力有很大的影响和冲击的，比如，我特别反对禁止野生动物进入市场这一说法，因为这并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一种先入为主的想象之上的，也不考虑民生、治安以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次新冠肺炎的主要来源是什么呢？是野生动物吗？事实上，科学家并没有给出非常确切的答案。相反，一开始被视为这场瘟疫起源地的华南海鲜市场，被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判断证实，它并非是这场瘟疫的起源地，因为最早的确诊病例跟华南海鲜市场根本没有任何交集，它最多只是一个中转站而已。那么，基于一个没有科学依据的、上千万人从业的产业而言，禁止野生动物进入市场是不是对老百姓的名声、生计太忽视、太一刀切了。而且，在疫情刚刚暴发的时候，有一张华南海鲜市场上野生动物供应种类、价格的图片，在网络上广泛流传。我细看了一下，那张图片上面列的上百种所谓的“野味儿”，除了10种左右的小品种我无法判断有没有大规模人工养殖之外，其他绝大多数我都可以确定是大规模人工养殖的。那么，大规模人工养殖的动物，凭什么还说它是野生动物，凭什么要禁止食用。人工养殖和野生动物的概念是如何区分的？人们可能会说，这些动物带有这样那样的病毒，比较危险，所以要禁养。那我想说，鸡、鸭、鹅等禽类可能带有禽流感，且禽流感大暴发所造成的确诊感染病例、死亡病例是新冠肺炎的数十倍、上百倍，为什么没有要求禁养鸡、鸭、鹅这些家禽呢？还有，十多年前全球流行的“猪流感”大家应该记忆犹新。“猪流感”也是人畜共患的疾病，它所造成的感染和死亡病例也比新冠肺炎多得多，可以说不在一个数量级别上面，但是为什么没有禁止养猪呢？其实，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如口蹄疫、炭疽病、疯牛病等等，都比新冠肺炎可怕多了，但是并没有禁止养牛、养羊等。同样，很多所谓的“野味儿”正是由于有食用价值和经济价值才有大规模人工养殖的，这些物种也摆脱了灭绝的风险。人类禁止食用、破坏一种动物或者植物，是为了摆脱物种灭绝的风险。但实际上，防止物种灭绝风险的最好

办法就是让其具备经济价值，而且能够人工养殖、人工种植。因为通过人工繁殖，物种就会延续下去。如今，我们打着保护野生动物的旗号来禁止人工养殖，到底是好是坏呢？其实，很多地方只适合养殖所谓的“野味儿”，不适合养殖鸡、鸭、鹅、猪、牛、羊等家禽家畜，因为这些家禽家畜会破坏植被，只适合在偏僻的环境养殖。养殖“野味儿”既可以发展经济，又可以保护生态环境，还可以吸引游客来旅游，带动常住人口就业，。

在城市化进程当中，很多村庄变成了无人村，这对我们的社会治安甚至国家安全带来隐患。在广大农村地区发展养殖、种植产业，这既是一个解决风险的办法，也是一种比较好的实现经济增长的渠道。

实际上，我们现在要想恢复、激发经济活力，不能光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归根结底，还是要减少过度管制，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居民的自我奋斗活力能够得到更加自由的发挥，这是关键的一点。

根据“学习中国”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文韬 赵春燕 侯欣

#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与基本经验

北京市委党校 刘智峰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强调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文章主要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历史进程，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六条经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史；社会主义；挫折；转折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对历史的学习。2013年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2019年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工作条例》，其中专门提到了要学习党史。另外，2019年中央在进行主题教育时专门有一期要求学习党史和新中国史。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经有100年（从1920年共产主义小组的组建之日起开始）了，那么，百年的党史应该怎么去划分呢？按照中央的说法，一个党史一个新中国史，所以按这个来区分的话，我们认为党史基本上可以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党史和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史。



今天讲解的主要内容以1949年之前的党史为主，因为1949年之前的党史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很多年轻的同志不是很了解。

下面，我们分三个部分来讲解这个问题。

## 一、百年党史的基本脉络

近百年以来，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要有一个基本把握，即一个大的脉络就是三个阶段、三件大事。简单来说，三个阶段、三件大事就是革命、建设、改革开放。

### （一）三个阶段、三件大事

第一阶段（1921-1949年）：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阶段我们简称为“革命”；第二阶段（1949-1978年）：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一阶段我们简称为“建设”；第三阶段（1978年至今）：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阶段我们简称为“改革开放”。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个阶段是不断进步、不断壮大、不断飞跃的。

第一阶段，我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壮大。这一时期，领导的还是根据地、边区，中国共产党只是在一部分地区执政。到了第二阶段，出现了一大进步，中国共产党开始在除台湾以外的整个大陆执政。第三阶段，打开国门走向世界。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以下简称“两个不能否定”）。新中国70年的发展是连续的，前30年的发展为后30年的改革开放打下坚实的基础。

### （二）挫折与转折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个人、一个党都不可能永远正确，都是在经

过了坎坷、挫折后不断走向成熟的。当然，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从我们党的历史来讲，我们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这三个阶段都经历过一些坎坷和挫折。

## 1. 四次挫折

### (1) 建国之前的两次挫折

第一次挫折：1927年4月12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我们遭到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屠杀，党员人数从6万下降到1万以下，这是我们党非常危险的时期，也可以说是党的生死存亡关头。

第二次挫折：1934年10月主力红军被迫长征。我们经常讲，红军长征是一次了不起的胜利，但实际上它也是一次大的挫折，因为根据地都丢掉了。

长征之后，毛泽东同志讲过，苏区的损失是100%，白区的损失是80%，过去的革命取得的成果都丢掉了，得重新去找根据地、落脚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49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这段时间，建设社会主义对中国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在探索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犯了一些错误，经历过一些坎坷和挫折，这在中央批准出版的《党史》一卷、二卷中都实事求是地记载下来了，其中很多的经验教训也是值得汲取的。

### (2) 建国之后的两次挫折

建国之后的第一次大的挫折：1958—1960年“大跃进”失败之后带来的严重的粮食问题。那时，大家都去大炼钢铁，很多粮食都没有收上来，再加上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下降，所以粮食问题是非常突出的。据时任国务院分管粮食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年谱记载，1959—1962年这几年，几乎每天他都在考虑、研究给中央报告粮食问题。在缺粮最严重、最紧张的时候，北京和天津的粮食最紧张的时候库存不够销售一周，有时候仅够销售四五天。这种情况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大会之后才逐渐得到缓解，走出困境。

建国之后的第二次大的挫折：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这

是一次巨大的挫折，我们把它称为大动乱或者浩劫。而且，中央对十年“文化大革命”是坚决否定的。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同志讲过，“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教训是要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

中国共产党了不起的地方不在于不犯错误，永远正确，而是没有被任何一次的坎坷、挫折打倒，能够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并站起来，修改过去的方针政策。所以，道路越走越宽广。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讲，中国共产党善于自我革命。

## 2. 四次转折

### （1）革命年代两次大的转折

1927年8月7日，中央决定拿起枪杆子反抗国民党，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这是第一次大的转折。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同志回到了领导岗位。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军事上，摆脱了过去被敌人围追堵截的困境，到敌人的薄弱地方去，最终到陕北奠定了新的基础。

### （2）建国之后两次大的转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转折，也可以说是转型。之前是革命党，目标就是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转型成为执政党，主要任务是建设国家、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综合国力、实现民族复兴。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次最根本性的转折。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可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当代中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一次转折，有了这一次转折，我们真正实现了改革开放，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经济社会也得到了巨大发展，所以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

### （三）两大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依靠什么成功？指导思想是什么呢？列宁曾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近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上有两大理论成果：

#### 1.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包含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关于革命的，即1949年之前；第二部分是关于建设的，即1949—1976年这一段。

####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这是我们近百年党史的两大理论成果，2019年在进行主题教育的时候，中共中央专门印发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其中明确提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是这样去划分两大理论成果的。

### （四）思考两个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讲我们要有问题导向，要带着问题去学。那么，我们在学习、回顾近百年党史时，也要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为什么成功了，有哪些启示？第二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基本经验是什么？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历史

### （一）第一阶段：从建党到大革命失败（1921—1927年）

1921—1927年的6年时间，我们把它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在这一阶段，我们也犯过一些错误，但回顾历史，有些错误也是难免的，

因为任何事物的成长都需要一个过程。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就像“刚出生的孩子”，比较稚嫩，找不到方向，需要别人来帮助。所以，我们需要依靠苏联、共产国际。

### 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习近平总书记讲过，中国共产党第一姓“共”，第二姓“党”。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史学界公认的最早把马克思的思想传到中国来的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1899年2月到4月，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文章《大同学》，文章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社会主义及《共产党宣言》。这也就是说，他把一些新的思想带到了中国。1898年6月11日戊戌变法开始实施。之后，大量西方的新思想传播到中国来。那时候的中国人在寻找各种各样的真理、道路来救国救民，但是感到我们自己的思想失去了作用，所以开始向西方寻找，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背景。

1902—1904年，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也几次讲到马克思。其实，李提摩太跟梁启超、康有为都是很好的朋友，梁启超通过李提摩太和他的报纸了解到马克思的思想，开始在国内介绍。毛泽东同志跟埃德加·斯诺讲过，他年轻的时候最爱读的报纸就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1905年11月，国民党早期著名的理论家朱执信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2期发表文章《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以及《共产党宣言》的内容。

可以看到，上述这些人物都比共产党要更早了解马克思主义。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讲过，国民党宣传马克思主义比共产党还早。这说明戊戌变法之后，西方的思想大规模的传到中国来，各种报刊都介绍马克思、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新思想。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李提摩太、朱执信、梁启超等都在文章中介绍马克思的思想多么伟大、多么了不起，但是谁也没有看到它真正发挥作

用，最终变成实践。可是，十月革命不一样，列宁是世界上第一个运用了马克思思想和理论，并把理论变成了现实的人。他把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真正地从天上落实到地上，让中国人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威力，加快了其在中国的传播。那时，世界上一些知名的思想家、文人都到过中国，其中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影响比较大。泰戈尔来中国之前，在一家报纸所做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的民意测验中名列第四，获得17票，而列宁则以497票名列榜首。可以看到，泰戈尔来到中国了，但影响就那么大，列宁没有来，却名列榜首。在北京大学的另一次民意测验中，1007人中有725人欢迎“人民革命”，497人相信苏联是中国最好的朋友。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宣布了《加拉罕宣言》，废除了过去沙皇政府和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特权也都被取消了，这让中国人感到非常振奋。鸦片战争之后，包括沙俄在内的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把中国当成劣等民族看待。而《加拉罕宣言》平等地看待中华民族，从这件事上加深了中国对苏联的好感，从而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要信奉马列主义呢？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也有很多大思想家，如老子、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康有为、梁启超等。我们为什么不用他们的思想指导我们呢？为什么非要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呢？这里面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不能指导我们走向现代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同志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篇文章中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1917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发现自己的思想文化都落后了，于是开始学习西方的新思想。到“五四运动”后，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都已传到中国。我们要知道，

“五四运动”是有一个变化的，早期传播的思想是民主、自由，倡导“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因为“德先生”和“赛先生”是美国的，所以我们说以美为师。到了后期，马克思主义逐渐占了上风，我们称其为以俄为师。

1919年5月，《新青年》杂志刊出了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这是非常大的进步。前面讲过，早期马克思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都是一篇一篇的文章，像朱执信、梁启超等写了很多单篇文章，但他们并没有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因为他们没有条件去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但是，李大钊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李大钊毕业于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政治系，所以他有条件也能够读得懂《资本论》的原文，因为日本比我国更早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日本有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幸德秋水、河上肇对李大钊都有很深的影 响，李大钊在对马克思主义做深入研究、完整概括后，发表了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对马克思学说做了系统的、比较完整的论述。他主要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以及政治经济学。这个时候，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达到了一个高度。

过去，我们看到的都只是介绍，并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但陈望道将马克思主义最通俗也是影响最大的著作——《共产党宣言》带入中国。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出版，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解放以后，陈望道担任过复旦大学校长。当年，他还是一个年轻人，陈独秀委托他翻译《共产党宣言》，翻译完之后陈独秀拿去印刷了300册。印完后发现，封面上的题目被印成了《共党产宣言》（见图1）。于是，陈独秀就说别拿去卖了，留着自己送人。之后，赶紧将封面上的题目修改过来，又印刷了1000多册（见图2）。当年，全国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广州都有一些受陈独秀影响的年轻人办的书店。陈独秀把这1000册《共产党宣言》发到这些地方去卖。让陈独秀没有想到的是，1000册《共产党宣言》很快就卖完了。



图 1: 《共产党宣言》封面



图 2: 《共产党宣言》封面

从1920年8月到1921年年底,《共产党宣言》的销量竟然达到了1万多册。要知道,当年整个中国社会的文化程度还是不高的,白话文也还没有普及,甚至还有很多文盲,所以1万册的销量是不小的。这说明,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是如饥似渴的。当思想传播到这样的程度时,也就具备了建党的条件。



## 2. 共产主义小组的组建

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来华，他先到北京见李大钊，李大钊又推荐他到上海去见了陈独秀，筹备建党工作。可以说，一直到维经斯基见到陈独秀，建党工作才取得了巨大突破。事实上，维经斯基并不是第一个到中国来商量建党的人，但是他却成功了。

### (1)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之后，共产国际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到东方，如朝鲜、日本、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去建党。共产国际建立了远东局、海参崴分局，还在上海建立了东亚书记处，派了好多人到中国来找合适的人建党，但都没成功。为什么没成功？因为找到的人都不太合适，没有才干、没有名气、没有能力、没有号召力。但是，陈独秀同意建党之后就不一样了。陈独秀的威望、地位是非常高的，过去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文科学长，“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风云人物。毛泽东同志说他年轻的时候最崇拜的人就是陈独秀，这是不得了的。可以想象，这样的人物出来建党，威望、地位都足够，理论水平、组织能力一呼百应，所以取得了巨大的突破。

1920年8月，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任书记，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提出通过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主张。在陈独秀的推动之下，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都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所以，党史学界一般都认为到2020年，中国共产党应该就成立100年了。

1926年，时任中宣部长蔡和森到莫斯科去给东方大学的学生作报告，他认为共产党是1920年成立的。在过去的档案材料记载中，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毛泽东同志填的登记表上写着，入党时间为1920年。而且，不仅仅是中共党史学界这么认为，日本、俄罗斯都认为中国共产党是1920年成立的。

### (2) 北京共产主义组织

1920年的10月，李大钊发起建立北京早期共产主义党组织。在党组

织成员中，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范鸿劼都是北大的，何梦雄、张太雷、缪伯英不是北大的，缪伯英是中国共产党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 3.中共一大召开（1921年7月23日）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到一定程度时，《共产党宣言》出版，共产主义小组组建，之后一步一步发展到建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一大。当时，我们党是非常弱小的，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3人，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张国焘主持一大，毛泽东、周佛海做记录，这说明中共一大的核心人物是张国焘。

#### （1）中共一大的成果

中共一大通过了很多重要的纲领、文件，至今影响深远。

#### 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

#### （2）中共一大的机构

党的早期机构的名称是不断变化的。中共一大鉴于当时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决定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

我们知道，中共一大召开时陈独秀因工作脱不开身没有参加，但因为陈独秀的威望最高，所以大家推选他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中共一大是秘密召开的，但开会到最后一天的时候，还是被租界的密探发现了。

之后，又转移到浙江嘉兴去开。可见，那个时候的党是非常弱小的。如果我们现在去看1921年时中共一大召开时的报纸，如著名的上海《申报》，会发现当时还成立了无数的政党、公司，但今天绝大多数都不存在了，都被历史淘汰了，只有中国共产党还在不断发展、不断壮大。

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同志说，1921年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就改变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改变了方向。这也就是说，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历史就改变了方向，我们不再走老路，而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了。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是非常弱小的。《庄子》有句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事物开始时单纯细微，临近结束时变得纷繁巨大。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同志讲到，我们现在还没有“毕”，但已经很大，这以后的24年就不得了，是中国天翻地覆的24年。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有50多名党员，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我们已经有100多万党员了。我们领导的根据地有接近一个亿的人口，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 （3）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产生之后，早期主要是领导工人运动。

一是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要求增加工资，遭到英国资本家拒绝后，就在海员工人的工会组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苏兆征、林伟民等领导下，开始举行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是我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一次重要的罢工斗争。

二是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罢工。中共一大结束之后，毛泽东同志就回长沙了，在长沙建立了湖南省第一个党支部，他任党支部书记，随后逐渐领导工人运动。1922年9月14日，安源路矿工人要求当局承认俱乐部有工人代表的权利和增加工资举行罢工。路矿当局勾结军阀派兵镇压。在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的领导下，一万七千多名工人英勇斗争，迫使路矿当局承认工人提出的大部分条件，18日，罢工

取得了胜利。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的胜利，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

**三是 1922 年 10 月 23 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1922 年 10 月，开滦煤矿的工人代表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要求。开滦矿局不仅拒绝了这些要求，还蛮横地扣留了工人代表。开滦矿工忍无可忍，10 月 23 日，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特派员彭礼和、共产党员王尽美、邓培等人的指挥下，罢工开始了。

1922 年 10 月 23 日开始的开滦煤矿工人反帝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北方最著名的罢工，在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四是 1923 年 2 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主要领导就是二七罢工的主要领导，即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京汉铁路大罢工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最勇猛的奋斗精神和最伟大的牺牲精神。它以工人的头颅和鲜血，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人民更加认识到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军阀是中国各族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必须与之斗争到底。这次罢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

1924 年 1 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该政策的贯彻和坚持，保证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顺利开展，成为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孙中山看到了，尽管辛亥革命比俄国十月革命早了 6 年，而且辛亥革命也成功了，但成功之后我们并没有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相反，俄国十月革命在成功之后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因此，孙中山决定向苏联学习，开展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很多著名的党的领导人，如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 10 名共产党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同志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大家知道，当时的部长是汪精卫，但由于汪精卫不到任，所以主要的工作实际上都是毛泽东做的。著名作家茅盾是毛泽东同志当年的秘书。前几年，中央披露了一些毛泽东和茅盾的信件来往，主要内容是指导他怎么去做这个工作。

#### 4. 国共合作成果——北伐战争

国共合作之后，建立了黄埔军校。另外，国共合作之后很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北伐战争。

孙中山一生的奋斗就是为了统一中国，但他没有实现这个愿望，出师北伐就是为了完成孙中山的遗愿。1926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起兵向北攻打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奉系军阀张作霖。可以说，北伐战争打得一路顺利。实际上，那时候的国民革命军还是比较弱小的，只有10万人的军队，而军阀孙传芳、张作霖的军队加在一起接近100万。但是，由于北伐军是由党领导的、为国家为民族而战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新式军队，所以北伐军以少胜多，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

#### 5. 第一次挫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因为北伐军打得比较顺利，蒋介石开始权力膨胀，逐渐表现出对共产党的不满。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下决心清党反共。“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蒋介石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李大钊、陈延年（陈独秀儿子，时任广东区委书记）、陈乔年、萧楚女等著名的共产党人被杀害。1928年初，26000多名共产党员被杀，党员人数从6万锐减到1万。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的第一次巨大挫折。

### （二）第二阶段：土地革命的十年（1927—1937年）

土地革命的10年，我们称其为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慢慢地成长起来了。

#### 1. 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驻守长沙的武汉国民政府辖军、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蒋介石的唆使下，于1927年5月21日发动了长沙马日事变，屠杀共产党人。那时候，汪精卫也在武汉，但他还没有叛变。可是到了7月15日，汪精卫也叛变了，跟蒋介石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史称“宁汉合流”。显然，我们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1927年7月20—25

日左右，中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大家知道，南昌起义是1927年8月1日发动的，从决定起义到8月1日也就1周左右的时间，非常紧迫。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作出起义的决定，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邓演达、谭平山、恽代英、彭湃等具体实施领导，周恩来任前期委员会书记，贺龙、叶挺负责主要的武装力量，都是张发奎的部队。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进攻。1927年8月3日起，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准备把队伍带到南方去，到广东、潮汕去建立根据地之后再继续北伐。另外，共产国际准备给中国共产党武器和军事援助。1927年9月18日，部队进抵广东大埔县城。9月20日，前委根据形势发展作出了分兵部署：周恩来、贺龙等率领主力向潮州、汕头进发；第9军副军长朱德率领第11军25师和第9军教导团共约3000多人，据守三河坝，掩护主力南下。但是，周恩来、贺龙、叶挺带着部队往潮汕打的过程当中遭遇了失败，对整个起义军的影响比较大，好多干部、战士都灰心了。这时，朱德在江西安远的天心圩召开军人大会。他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朱德讲了这番话之后，军官们都稳定下来了，都不走了，留下的这些人后来都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朱德后来讲，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危险、最关键的时候，为这支军队保留了火种。

南昌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后来我们在党史上评价南昌起义，包括周恩来、张太雷在评价南昌起义时，都认为它有缺点，那就是单纯的军事冒险，没有发动群众，没有搞土地革命。

## 2.第一次大转折——八七会议（1927年8月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之所以说此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转折，因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生了改变。“八七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消了他在党内的职务，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实际上，我们是在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罗明纳兹的指导之下才逐渐成长起来的。

“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过去我们说国共合作，但现在彻底翻脸了，我们就得拿起枪杆子跟国民党斗争了。毛泽东同志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口号，在世界上广泛传播。他说，我们过去说国民党、蒋介石不重视军事，但人家后来有了黄埔军校，有了军队，这说明人家开始重视军事了，可是我们不重视，所以我们要拿起枪杆子反抗国民党。

### （1）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上，中央决定举行秋收起义。事实上，很多地方都进行了秋收起义，其中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影响最大，大家印象最深刻。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主要领导人是毛泽东、卢德铭、余洒度，卢德铭和余洒度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我们说秋收起义是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开端，为什么呢？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建立了军队武装夺取政权，放弃了过去跟人家合作的思路。那建立了军队之后应该打哪里呢？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受共产国际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都认为应该打大城市，打中心城市。因为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都是城市革命，而毛泽东当时就看到我们的力量还是比较弱的，在城市里站不住脚，因而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最后夺取政权，这是第二层含义。那时候，毛泽东的思路在中央还不被很多人接受，直到30年代的时候，大家才慢慢意识到毛泽东提出的路线是正确的。

## (2) 中共六大 (1928年6月)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国民党的追捕非常严酷，没有开会的条件，斯大林建议到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所以，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开的会。这次大会，在斯大林的指导下，我们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总结了党的政治路线。我们把“八七会议”之后的一段叫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就是光发动军事暴动。后来，广州起义爆发，但最终失败了。这时，斯大林告诉我们，党有军队虽然很重要，但是还是要做群众工作、政治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中共六大上，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周恩来被选为中央常委秘书长。向忠发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工人出身的总书记。他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大革命失败之后，共产国际认为我们党的领导人里没有工人是不行的，因为我们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瞿秋白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八七会议”之后，党的一系列文件都主张要提拔重用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因此，中共六大上一大批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进入了领导阶层。

## 3. 红四军九大——古田会议 (1929年12月)

1929年12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认真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多种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这些决议案系统地解决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应该说，这是党的历史上非常了不起的一次会议，对党和军队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转折。

1927年，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的队伍去打长沙，当看到大城市打不下来的时候，他就把队伍带到江西永新三湾村进行改编。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首次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实现了党对军队的领导。1929年



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古田会议决议，从理论上阐明了党领导军队的原则，并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些基本制度和措施。

过去，我们是没有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这些思想的。红四军七大、八大上毛泽东都是挨批的，并跟朱德产生了矛盾。直到红四军九大上，中共中央发来“九月来信”。“九月来信”是中共中央发出，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信中明确支持毛泽东的观点，意在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建设。所以说，古田会议的召开扭转了局面，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 4. “立三路线”及纠正

##### (1) “立三路线”

1930年6月，国内的政治情况出现了变化，爆发了中原大战，又被称为蒋冯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大战。当时，在上海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头脑发热，认为革命的高潮来了，觉得我们很快就能取得胜利，形成了“左”倾冒险主义。他提出的口号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也就是说要在大城市如上海、武汉、南京、长沙等地搞暴动，搞工人同盟罢工、学生罢课，然后聚集军队在大城市，再加上苏联的帮助，我们很快就能胜利。当时，连共产国际都觉得“立三路线”不实事求是，但李立三认为是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坚持推动他的“左”倾冒险主义，最后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立三路线”的影响时间并不太长，1930年9月，周恩来和瞿秋白从莫斯科回来，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会上纠正了“立三路线”，强调做事情不能太冒进，要看实际情况。

##### (2) 中央红军的三次反围剿

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稳定下来了，开始对付朱毛红军了。起初，蒋介石并没有把红军放在眼里，那时候红军只有两三万人左右，而国民党军

队人多。因此，他就想采取传统的大包围方法攻打红军，速战速决。

**第一次反围剿。**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之后，国民党又开始大举发动对苏区的“围剿”。当时鲁涤平任“江西剿匪总指挥”，他率领张辉瓒、谭道源的湘军和邓英新十三师的陕军，进攻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红一方面军。结果，又被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游击战术打得一败涂地，张辉瓒、谭道源一俘一逃，部队或全军覆没，或溃不成军，国民党参与“剿匪”的将领们个个面如死灰，谈“红”色变，鲁涤平也脸色无光。

**第二次反围剿。**有了第一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后，蒋介石开始重视红军了。他派出自己的嫡系何应钦，还有手下大将卫立煌、陈诚、蒋鼎文，出动了20万大军，但最后还是失败了。

**第三次反围剿。**这一次蒋介石亲自出马，调动了30万大军，结果又被红军打败了。事实上，三次反围剿中，我们都采取了游击战术，最后以少胜多。

## 5.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应该说这是一次让我们党进入挫折的会议。本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已经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但是米夫来了，批判了瞿秋白、周恩来，认为那时中央没有严格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因此，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提出了国际路线100%正确的口号，进一步造就了“极左”路线。在米夫的提拔下，王明一个普通党员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从那时开始，王明“极左”路线统治中央长达4年，直到遵义会议召开。这时，我们党出现了一系列重要事件：

**顾顺章叛变。**顾顺章年轻的时候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参加了“五卅”运动，并入了党，党派他去莫斯科学习政治保卫工作。顾顺章特别聪明，苏联克格勃的那一套特务技术他很快就学会了。学会之后得到重用，成长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时他还是中央特科的领导人。大家知道，中央特科的最高领导人是周恩来，顾顺章是二把手，著名将军陈庚还是顾顺章的副手。然而，1931年4月，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到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在返回武汉时被叛徒指认被捕，随即顾顺章叛变，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因为那个时候党的一些机构、领导人都在上海，特别幸运的是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我们党破获了。

**龙潭三杰。**前些年《人民日报》刊登过文章《龙潭三杰》，指的是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他们都是周恩来安插在国民党高层的卧底，将截获的顾顺章叛变的情迅速送到上海，周恩来、陈云、康生组织中共中央高层连夜大撤退。后来，周恩来多次讲到过钱壮飞，说如果没有钱壮飞，我们这些人早就没了。1935年，钱壮飞在长征的时候牺牲，这对我们党中央高层也是一次很大的打击。我经常讲共产党命不该绝，我们党的情报布置工作也是，因为我们党从危难当中走出来了，尽管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打击，但还是造成了一些损失，因为顾顺章的身份、地位，所以他掌握了很多情报线索，他把线索交代出去之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如蔡和森、恽代英都是因为顾顺章叛变而被捕的。另外，向忠发的被捕也跟他有关系，这一系列事件致使中央在上海没办法立足，王明就去了莫斯科。

**中央成立临时政治局。**1931年9月，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主要的领导人物是博古和康生，继续执行王明路线。博古原名秦邦宪，是我们党史上最年轻的总书记，当年才24岁，后来有人把他称为“娃娃总书记”。

**肃反扩大化。**此阶段出现了四次肃反扩大化，即张国焘在鄂豫皖、夏曦在湘鄂西、福建批“罗明路线”、江西批“邓、毛、谢、古”。

### 张国焘在鄂豫皖

前面给大家讲过顾顺章到武汉护送张国焘，张国焘要到鄂豫皖苏区执行王明的肃反扩大化路线，认为我们一些党的干部、军队的干部是反革命坏分子、敌人，所以造成很多冤假错案。张国焘搞了一个大规模的屠杀叫“白雀园大肃反”，杀害了红军优秀将领许继慎、曾中生。

### 夏曦在湘鄂西

1932年，夏曦任湘鄂西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在

此任上，他以抓所谓改组派、托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为名，杀害了大批红军将士，造成了湘鄂西苏区的极大危机。红军优秀将领段德昌在湘鄂西苏区被夏曦杀害。贺龙曾说，夏曦的“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

### 福建批“罗明路线”

1933年初，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认为，闽西根据地边缘地区条件困难，党的政策应不同于巩固地区。当时党内“左”倾错误领导人把这说成是“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 江西批“邓、毛、谢、古”

1933年反罗明路线时，在江西苏区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从实际出发，发表了一些有利于反“围剿”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意见，如反对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主张“坚壁清野”“诱敌深入”，不赞成“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硬拼打法，以抵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与策略。同年3月起，他们的正确意见和做法被临时中央指责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遭受残酷斗争并受到撤职等处分。

毛泽东被临时中央排斥，具体表现在赣南会议、宁都会议上。

### 赣南会议

1931年11月，中央代表团在江西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代表大会。当时，任弼时被指定为苏区中央局成员之一。大会批判了毛泽东的“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总的来讲，赣南会议夺了毛泽东的党权。

### 宁都会议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顾作霖、邓发、任弼时、项英等出席了会议。史称“宁都会议”。这次会议继续批判毛泽东，夺了他的军权，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接任，尤其是在年度会议上，大家对毛泽

东更是群起而攻之。唯一替毛泽东说话的就是周恩来，因为周恩来看到了毛泽东的才干想挽留他。

当时，毛泽东看到大家都排斥他，也不能再待下去了，就说去养病。实际上，毛泽东确实是生病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毛泽东当年的一些照片，头发很长，眼窝深陷。当年红军医院的院长傅连章，建国以后担任过卫生部部长，他去看毛泽东之后，怀疑他得了肺结核。傅连章就跟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说，毛泽东是身病好治，心病不好治。之后，徐特立去看望毛泽东，见毛泽东情绪不太好，他就跟毛泽东讲了两句诗：“丈夫落魄纵无聊，壮志依然抑九霄。”以此鼓励毛泽东。毛泽东一看老师都担心了，叫他的警卫员给老师送了两句诗，出自毛泽东年轻时候写给罗章龙的《送纵宇一郎东行》：“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意思就是说，大丈夫有什么事看不开，应该把宇宙看得跟小米粒似的。天下动荡哪里值得左顾右盼，纷繁人间大事需要我们来料理。之后，毛泽东慢慢从挫折中走出来。

## 6. 第二次大挫折——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3年初，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当时毛泽东离开了军事领导岗位，由周恩来指挥反围剿，运用了游击战法，最终取得了胜利。可是，1933年9月的第五次反围剿我们失败了，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的军队增加了，调动了100万大军，采取了“铁桶战略”；另一方面，也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最重要的原因是指挥上的失误。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军事指挥权落到了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德国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身上。由于他不太了解中国的情况，认为打仗就是正规军作战。而且李德来了之后听林彪说，毛泽东是靠游击战术来打仗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事实上，毛泽东的“跑”不是消极的逃跑，而是在打仗过程中寻找机会，但李德就认为是“逃跑主义”，在指挥中共第五次反围剿时“御敌于国门之外”，寸土不让、寸土必争，“硬碰硬”之后广昌失守，最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

## 7.第二次大转折——遵义会议

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失败的教训当中大家认识到了毛泽东的正确，尤其是留苏派张闻天、王稼祥，他们过去是反对毛泽东的，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都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所以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王稼祥他们都团结起来扭转了局面，毛泽东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因此，我们说遵义会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 （三）第二阶段：从抗战到解放（1937—1949年）

这一阶段，党和军队都日益成熟起来了，在成熟的过程当中也产生了党的领袖毛泽东，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 1.洛川会议

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确定党在抗战时期的纲领、路线和政策，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

洛川会议上，党改变了军事战略，决定放手发动敌后游击战，开辟敌后战场，不能跟日本的军队面对面去打，因为那个时候正面战场主要是国民党的军队，我们的力量还是比较弱小的。日军占领北平之后一路南下，很多大城市都被日本人占领了，但郊区、山区都是政治空白，共产党就在那里去了。

#### 2.毛泽东思想的初步成熟

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初步成熟的时期。1930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是为了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指出不能光是照搬莫斯科的大本子，必须进行调查研究，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1938年8月，王稼祥回国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支持毛泽东的路线，明确中央以毛泽东为首。事实上，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王明回来了，跟毛泽东在思想上、组织上都产生了矛盾。因为王明也想当领袖，那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要听共产国际的，所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

特洛夫提出了非常明智的要求，他明确讲毛泽东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王明不能当领袖，中国共产党要以毛泽东为领袖。有了共产国际的支持，193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统一了思想，毛泽东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1937年7月和8月，毛泽东写了著名的“两论”，即《实践论》和《矛盾论》。过去，党内很多人都认为毛泽东就会打仗，没有思想，没有理论。王明、张闻天都是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喝过洋墨水，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毛泽东发愤读书，写出“两论”，影响很大，奠定了毛泽东党的最高理论权威地位。后来，陈云说，“‘两论’一出，全党服气”。

### 延安整风运动（1942—1945年）

延安整风运动进一步批判了王明的教条主义和党内存在的经验主义，包括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

首先是党内整风。1942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统一思想，会议至1943年1月14日结束，共进行88天。

其次是文艺界整风。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遵照这次座谈会制定的文艺方针，全面展开了文艺整风运动。

1943年7月5日，王家祥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

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了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学党史、学两个决议，一个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有一个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个决议梳理了我们党成立之后，1921年到1945年的两条路线：毛泽东路线和王明路线，王明的路线是错误的，进一步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

## 中共七大

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基础之上，1945年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大家知道，党的六大是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按照我们党早期的惯例应该每年召开一次大会，那为什么六大和七大中间会时隔17年呢？实际上，从1929年中央就开始筹备党的七大，但条件始终不成熟，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党内的思想不能统一，直到延安整风运动以及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之后，全党思想才统一。

党的七大上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概括了“三大作风”，即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批评和自我批评。大会上还通过了新的党章，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

回顾我们的党史、党章，第一部党章是1922年中共二大上通过的，后来历次修改党章都没有提指导思想，因为我们是共产国际的支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我们独立自主了，所以才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

### 3.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为了和平，毛泽东去重庆谈判，跟蒋介石签订《双十协定》。中央那时候有一个打算，就是把中央的所在地从延安迁到离南京比较近的淮阴。我们把很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如吴玉章、林伯渠到哪个省去当省长，都已经规划好了，但是蒋介石是假和平，他利用谈判的时间调兵，用美国的军舰、飞机运兵，主要从华北往东北运；等到兵力运得差不多了，1946年7月全面内战爆发。当时，我们一些干部、战士心里都没底，因为国民党号称有500万大军，背后还有美国的支持。但是，毛泽东告诉大家，要有必胜的信心、信念。

### 毛泽东的军事战略

毛泽东在接见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喊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口号，告诉人们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武器，取决于战争的性质是不是正义，是不是有人民群众的支持。这句口号传播出去，非常振奋军心。



打仗首先要有必胜的信念，但光有必胜的信念是不够的，要有具体落实下去的军事战略。蒋介石的军事战略、作战目标就是要地盘、要城市、要交通线、铁道公路等，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就两条：一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二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为了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我们要集中比敌人多一倍、两倍、三倍、四倍，最多到六倍的兵力，在一个具体的战役战斗当中要占绝对优势，彻底消灭对方。这一条军事策略是非常厉害的，执行下去之后就看到国民党其实是不行的。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这是共产党没想到的，也是国民党没想到的。因为起初是一种敌强我弱的局面，共产党最早的设想是打5年，最长的设想是打15年，但共产党很快就取得了胜利，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战略。

#### 4.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建立28年的历史中，最早的时候工作重心都在城市，中央一直都在上海、武汉、北京等大城市，有的军队也在大城市。秋收起义之后，有了由城市向农村转移的倾向，因为我国的农民多，革命需要农民支持，后来逐渐接受了毛泽东的思想，即农村包围城市，工作重点也转移到了农村。后来，大城市也被共产党打下来了，革命快要胜利了，党的工作重心出现了第二次转移，重新由乡村转入城市。

在革命快要胜利的时候，毛泽东一点都没有自满，而是非常清醒、非常冷静的。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了“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还讲了一句名言：“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 三、中国革命为什么能成功？

第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换句话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革命就不能够成功，它不是一个口号，是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

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的时候毛泽东讲过，“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在这24年之中，经过共产主义小组，经过北伐战争，轰轰烈烈壮大起来了，但中间被人家拦腰一枪打在地上，爬将起来又和他打……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

第二，没有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中国革命不会那么快取得胜利。这里既要看到人民群众的作用，同时也必须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承认领袖人物的重要作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讲得非常客观，“我们不应该把一切功劳归功于革命的领袖们，但也不应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其实，世界革命都有它的领袖，如美国革命的领袖是乔治·华盛顿，法国革命的领袖是拿破仑，英国革命的领袖是克伦威尔，俄国十月革命的领袖是列宁，中国革命一直到遵义会议之后才一路顺利。我们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的28年里，以遵义会议为界，前14年因为没有找到合格的领袖人物，我们一路坎坷、一路挫折。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正确的领导思想让中国革命一路顺利。

第三，没有正确的理论就不能实现正确的领导。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这也说明理论一定要是正确的，如果理论脱离了实际，实践就会错误。1951年，胡乔木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一文，其中提到“党的正确领导，首先决定于对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错误的理论，可以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迅速归于失败，而正确的理论，却在最困难的关头挽救党，使革命逐步地走向高潮”。过去，我们照搬苏联，搞城市革命，失败了，一直到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口号，我们才按照理论去指导实践，最终取得胜利。

第四，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是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战略、策略是党的生命，这是1948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党内通报里反复强调的。28年的革命征程中，重要的战略和策略有土地、知识分子、统一战线。到解放战争后期，革命快要胜利的时候，重要的战略、策略是工商业。哪一条政策正确，人民群众就会支持哪一条。反之，人民群众就会反对。所以要不断去调整，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 四、中共百年奋斗的基本历史经验

第一，坚持走中国自己的符合国情和民情的道路。不能去照搬别人，照搬谁都不行，只有走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够成功。就像2020年春天我们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有人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学新加坡的“佛系”抗疫？要知道，新加坡的国土面积没那么大，跟我国根本不能比，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如果不采取严格的措施是根本控制不了疫情的。另外，因为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外国人不能直接照抄我们的“作业”，因为很多方面西方国家谁也做不到。

第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习近平总书记讲到，我们共产党第一姓“共”，第二姓“马”。我们是按照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指导党的工作，但是一定要知道，我们只是用它来指导，学习的是它的思路以及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绝对不能照搬。

第三，坚持与时俱进，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解

放思想，更新党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我们看到，近百年的党史和70年的新中国史，我们党的思想理论不断与时俱进，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党的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思想要跟得上时代的变化。

第四，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的领导和执政水平，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怎么保持党的先进性呢？就当前来说要全面从严治党，坚决反对腐败，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形式主义，保持先进性，才能实现正确的领导。

第五，坚持走群众路线，始终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讲过，解放战争是靠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战略以及人民群众的支持。东北局刚到东北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后来陈云给东北局有一个著名的指示——七七指示。陈云明确讲到，一定要到人民群众当中去，没有人民，我们就会死无葬身之地。那时，我们一些干部还有一些思想，想到大城市去，不愿到农村去，陈云讲要丢掉汽车、脱下皮鞋，穿上人民群众的衣服，说人民群众的话。

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是双堆集战役，我们活捉了国民党一个将军，这个将军跟解放军战士说，“我想看看你们解放军的后勤是怎么搞的”。要知道，国民党军队的后勤都是专业的后勤部队，当他看到解放军的后勤时大吃一惊，因为解放军的后勤工作几乎都是人民群众在做，没有专业的后勤部队。中国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人民群众愿意帮助中国共产党，而且都是自发的。直到今天，习近平总书记都在讲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第六，坚持从挫折和失败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在学习中进步。转折都在挫折后，这是一个规律。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几次大的挫折、大的转折，而且每一次转折都发生在挫折之后。这说明，共产党会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把错误的改正过来，抓住转折的关键时期，吸取教训，在学习当中不断进步。

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为第五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作序时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既重视学习又善于学习的政党。以学习立党，不仅要重视学习，还要善于学习。善于学习，最根本的是要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我们党一贯的优秀传统和宝贵的历史经验。

根据“学习中国”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文韬 侯欣 赵春燕

学习心得

# 当前网络民族主义思潮的特点及引导策略

河北廊坊师范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张春贵

**摘要：**民族主义是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产物，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程中，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而兴起的。1949年以后，共产主义成为我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民族主义以及其他各种社会思潮都处于销声匿迹的状态。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再次打开国门，西方思想文化大举“入侵”，知识界出现“全盘西化”的声音。作为一种应激性反应，民族主义思潮重新兴起。

**关键词：**民族主义；网络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一、从民族主义到网络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产物，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程中，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而兴起的。中国自古有民族问题、民族意识（如《左传·成公四年》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但没有形成理论形态的民族主义。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侵略，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有识之士如梁启超、孙中山等，引进民族主义以唤醒民众，救危图强。

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主导，民族主义以及其他各种社会思潮都处于销声匿迹的状态。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再次打开国门，西方思想文化大举“入侵”，知识界出现了“全盘西化”的声音。作为一种应激性反应，民族主义思潮重新兴起。

由于民族主义思潮往往诉诸情绪鼓动，缺乏具体的建设思路，不仅在理论上被自由主义批驳，在现实中也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韬光养晦”策略不符；民族主义出版物如《中国可以说不》等曾一度成为畅销书后，很快也受到了市场的冷遇。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意外为民族主义提供了一片“沃土”。网络空间门槛低、大众参与程度高，最适合民族主义这种偏重情绪化表达的思潮的传播。于是，民族主义的主要阵地转移到了网络空间，“网络民族主义”成为“民族主义”的一个新阶段。

## 二、“虽远必诛”：进击的网络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思潮在我国网络空间的传播，与网络普及的历程近乎同步。很多学者认为，人民网开设的“强国论坛”是民族主义在网络空间兴起的标志。如黄煜、李金铨指出：“自1999年人民日报网上的‘强国论坛’开办以来，互联网在塑造民间舆论，尤其是民族主义议题上，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

以“强国论坛”为起点，网络民族主义发展到今天，根据其群体的特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网络民族主义群体，包含在被笼统地称为“愤青”的群体中。所谓“愤青”（Angry Young Man），是指那些对社会不公平现象和经济、社会、政治、教育等制度有不满情绪的青年。这群青年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改变现状，只能通过语言来表达不满情绪。

20世纪末21世纪初，“愤青”群体大多是“70后”的大学生。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他们有着较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议政热情，但没有多少渠道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网络空间发展起来后，在现实中无法表达的民族主义情绪自然就找到了空间。这一时期的网络民族主义群体表现出较为浓厚的极端性和排他性，其标志性的话语就是“是中国人就转，不转不

是中国人”。但总体上这一阶段网络民族主义的面目还是模糊的。

第二阶段网络民族主义主要是“80后”群体，崛起于2008年奥运期间。2008年，北京奥运会圣火在伦敦和巴黎传递活动中遭到“藏独”分子的破坏和捣乱，甚至有传言称法国政客及部分企业赞助了“藏独”分子，其中包括家乐福超市。由此，国内民间出现大规模“抵制家乐福”行动。而这一时期的CNN、BBC等国外媒体，也发布了大量抹黑中国的不实言论，引发民众在网络上发起抵制CNN等西方媒体的行动，由此第二波网络民族主义崛起了。这个群体不是情绪化地抵制西方，而是从传播事实真相、消除误解入手，如有欧美留学经历的饶瑾和唐杰以此为宗旨，在2008年创办了Anti-CNN网站（四月网WWW.M4.CN的前身）。

2009年以后，舆论主阵地转移到了微博这一社交网络平台，“自干五”群体成为网络民族主义的主力。“自干五”群体热衷于传递正能量，注重强化民族认同感，弱化对政府的批评。在舆论场上，他们的文字作品主基调是辩护式的，自发对抗一些过分批评、反对政府的网络大V。

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胡锡进出任《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总编辑，《环球时报》从一家小报快速发展成为举足轻重的报纸，在网络舆论场掀起了一场又一场风波。《环球时报》被公认为是民族主义色彩强烈的报纸，其对民族主义思潮的迎合使其大获成功，同时也进一步鼓励、推动了网络民族主义思潮。

第三波网络民族主义是以“帝吧网友”“小粉红”“饭圈女孩”等年轻群体为代表，表现出不同的面貌。“帝吧出征，寸草不生”，这是2016年前后在网络空间广为传播一句口号。受台湾女歌手周子瑜“台独”事件持续发酵的影响，在蔡英文赢得台湾大选之后，以百度贴吧“帝吧（李毅吧）”网友为主体的大陆网民，翻墙到社交网站Facebook蔡英文粉丝专页和其他台独势力媒体的主页，进行抨击“台独”势力、传播统一思想的网络舆论战，引发强烈反响。

2016年初发生的“FB表情包大战”是“小粉红”群体走进大众视野



的转折点。此后在“电影《没有别的爱》争议”“南海仲裁案”等一系列网络事件中，“小粉红”群体证明了自己不可忽视的存在。“小粉红”的称呼，最早源于晋江文学城论坛，论坛有一批作者经常批驳美化西方、专发我国政府负面信息的行为，该论坛主色调是粉红、以女性为主，这一群体就被称为“小粉红”。经过一系列事件的推演和炒作，“小粉红”逐渐成为新一代网络民族主义的代名词。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6年12月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2016年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小粉红”群体崛起，他们显示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现有体制的捍卫，敢于在公开场合和互联网上表达爱党爱国情感。

流行趋势是变动不居的。2019年一系列大事件表现最为突出的是“饭圈女孩”和“帝吧网友”。所谓“饭圈女孩”，最初笼统地指有偶像的追星女孩的统称，后不特指某个明星的粉丝群体。与传统意义的饭圈不同，她们自发集结而成，用特有的饭圈文化，在海外社交媒体上与西方媒体谈笑风生。在香港乱局之际，越来越多的中国艺人在海外社交平台发声支持香港警察，高喊“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争做国旗“护旗手”而遭到香港示威者的辱骂，被曝光隐私和行程，甚至受到暴力攻击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各家“饭圈女孩”在2019年8月14日晚上形成“统一战线”，自发集结成数量庞大的“网络远征军”，用特有的饭圈文化，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向发表“港独”言论的人开战，“抱走我家阿中（中国）哥哥，请‘港独’独立行走，不要来碰瓷。”在针对港独势力的舆论战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8月18日的新闻联播还专门提到“饭圈女孩”和“帝吧网友”，称他们体现了“止暴制乱的主流民意不可违”。

“饭圈女孩”在公众中的形象，一向是和非理性追星、拜金攀比、网络暴力等负面标签相关，其所形成的独特的“饭圈文化”，频惹众怒。但在事关民族大义的问题面前，表现抢眼。

### 三、“表情包”：第三波网络民族主义的特点

民族主义通常是年轻人的事业。民族主义的代际更替，除了与社会形势变迁密切相关，往往也伴随着青年群体的代际更替。每一阶段民族主义思潮的特点，通常也是由当时的年轻人群体的成长背景决定的。与前两波网络民族主义相比，第三波网络民族主义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从应激型民族主义转向自发型民族主义。**前两波网络民族主义主要是受到外来刺激而形成：1999年中国驻原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等外来的军事挑衅，引发国内第一波网络民族主义的勃兴。2008年，在全国上下准备奥运盛会之际，国外媒体的污蔑和少数群体的破坏行为，导致了第二波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

一方面，以“小粉红”“九零后”“饭圈女孩”为标志的第三波网络民族主义，其崛起更多是自发的力量。他们成长的时代，我国社会物质资源已经非常丰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

另一方面，这一代人出国留学更为普遍，很多人亲身见证了西方社会的经济不景气、恐怖主义导致的社会紧张、普遍缺乏安全感等问题，对于祖国的发展前景更加自信。2015年大阅兵期间，一个年轻人在微博上写下“这盛世，如你所愿”的文字，就体现出了这种民族自信。

**从防御型民族主义向扩张型民族主义转型。**西汉名将陈汤曾言“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是令民族主义者血脉贲张的一句话，由此演化来的“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也成为网络民族主义最具典型的口号。

前两波网络民族主义兴起的时候，“虽远必诛”还只是个口号。过去面对使馆被炸、南海撞机等敌对行动，以及在保钓、南海争端等一系列议题中，我们只能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进入21世纪20年代，国际形势大有改观：我国第一艘航母建成交付使用、多次海外撤侨行动、党中央对捍

卫国家领土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决心、“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发展和治理注入新活力与正能量……以上这些都使人们信心倍增。在这种社会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自然会有“虽远必诛”、主动出击的底气和愿望。

**话语形态由宏大叙事转向消费娱乐。**此前网络民族主义的叙事是宏大的，思想起点往往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耻辱史，饱含了民族仇恨情绪，话语是沉重的。新一代网络民族主义群体，话语更多的是娱乐化。即使是谈近代史，也更愿接受《那年那兔那些事儿》为代表的“萌萌哒”近代史，以动漫形象表达沉重主题。在2016年初的“FB表情包大战”中，尽管两岸问题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但在此过程中被娱乐化，政治议题被拆解为建筑、汉字、美食等多个话题，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政治话语也被做成表情包，淡化了政治意味。在2019年的“守护阿中”行动中，“饭圈女孩”依靠其在追星过程中形成的“舆论战”技巧，充分运用分享文案和图集，熟练切换多个账号迅速占领评论区制高点。

**更多依靠网络参与而非线下行动。**民族主义思潮在线下最主要的表现是各种抵制运动和游行示威。这些行动对涉事国家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但对于民族主义自身也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以2012年的西安“9·15”反日寻衅滋事案为最。此次行动中，1991年出生的男青年蔡洋砸伤了日系车主李建利，被依法判处10年有期徒刑。

线下抵制行动并不是新一代网络民族主义群体最青睐的手段，他们更喜欢线上解决问题。“90后”“00后”群体是网络“原居民”，网络天然是其生活世界的一部分。不管是生活还是政治问题，都可以在网络上解决。既然网络行动可以实现那么多诉求，那么也就没有必要采取线下行动了。

#### 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民族主义思潮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

国的国际社会地位大为提高,在捍卫国家利益方面也采取了更为坚定和灵活的立场。着眼于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加强练兵备战,有效遂行海上维权、反恐维稳、抢险救灾、国际维和、亚丁湾护航、人道主义救援等重大任务。人民军队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坚定步伐。

在这种形势下,网络民族主义思潮渐趋缓和,网络民族主义群体更乐于成为主流舆论的辅助团队,成为一种积极的建设力量,如大量粉丝组成“中国外交部天团”“局座召忠后援团”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网络民族主义思潮日益成为各种社会思潮和利益诉求的集散地,成为意识形态较量的主战场。对当前我国网络民族主义思潮,应坚持以下几点:

第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网络民族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爱国,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有积极作用,可以克服民族主义作为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负面作用,避免狭隘民族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将网络民族主义群体对国家的热爱与民族的忠诚之情植根于内心,并将这种情感转化为切实的、持之以恒的理性的爱国行动。

第二,充分发挥网络民族主义的积极因素,同时也要警惕其负面因素。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网络民族主义对于凝聚民族精神、激励民族斗志具有重大作用。

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民族主义的出发点和归结点都是本民族利益,因此它在对本民族利益强烈关注的同时,容易导致对其他民族利益的忽视甚至否定。如果发展到极端、非理性的程度,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当今世界上,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三股势力”威胁上升,往往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有很大关系。我国安全形势

也同样不容乐观，“藏独”“疆独”等分裂势力，其思想基础也是极端民族主义。

第三，坚守法律底线，依法严惩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寻衅滋事者。对于网络民族主义思潮引发的线下活动，应当坚守法律底线，对于打着民族主义旗号行寻衅滋事之实的做法，必须予以依法严惩。上文所述的2012年西安“9·15”反日寻衅滋事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总的来讲，网络民族主义思潮更多表现为一种情绪化的思潮，缺少足够的理论基础，而且有时候与“狭隘民族主义”“民族分离主义”以及“极端或激进民族主义”界限不清。

因此，当前我国网络民族主义思潮需要以理性的爱国主义热情来进行引导和规制，使其服务于民族复兴大业。正如王炳权教授所指出的：“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尽管理论表达尚不成熟，但只要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民族复兴为旨归，其一定程度上可成为整合和高扬中华民族精神重要而有效的方式之一。”

根据“学习中国”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文韬 侯欣 马程



# 新时代创造新模式 新模式学习新思想

## 学习中国智慧党建运管中心

智慧党建运中心（智慧党员活动室）是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知识组织、智能云平台基础上，再运用AI、VR和多媒体技术打造的多网跨终端共享的全场景智慧化党建多功能中心，是党员个人活动和组织活动的智慧空间。它把一个传统的物理空间变成一个大的智能终端，为新时代的党建工作插上信息化和智能化的翅膀，开启智慧党建新模式，开创全场景智慧党建新时代。

### 创建中心的目的

- 为智慧党建引领示范
- 构建全场景智慧化党建新模式
- 解决个人学习与集体学习“两张皮”问题
- 解决内容和技术“两张皮”问题
- 解决线上线下“两张皮”问题
- 解决单位内部的多平台和信息孤岛问题
- 解决多网融合问题
- 解决多终端融合共享问题

### 建设中心的重要意义

- ◆ 中心是党建智慧化重要标志
- ◆ 中心是提升基层组织执政能力的智能空间
- ◆ 解决个人学习与集体学习“两张皮”问题
- ◆ 中心是提升党员综合素质的智能教室
- ◆ 解决线上线下“两张皮”问题
- ◆ 解决单位内部的多平台和信息孤岛问题
- ◆ 解决多网融合问题
- ◆ 解决多终端融合共享问题



出品单位：《中国企业报》集团智慧党建研究院

联系方式：010-62805956、68001238

联系人：薛红霞15010167295 王强18518039399 刘红13126508885





# 文明十二家

# 盛开幸福花

WENMINGSHIERJIA SHENGGKAI XINGFUHUA

文明十二家是家风建设的好形式  
文明十二家是和睦家庭的芬芳园  
文明十二家是幸福家庭的欢乐谷  
文明十二家是文明家庭的小舞台  
文明十二家是文明乡风建设的专业户  
文明十二家是良好家风传承的推进器  
文明十二家是淳朴民风形成的加油站



学习中国微信公号 "学习中国"APP 世界家风微信公号

刊号 | CN 42-1837/C  
ISSN 2095-5103

邮发代号 38-406

国内定价15.00元